

觀 察

· 每份一角五 ·

· 三十七年十月十六日 ·

· 逢星期六出版 ·

第 八 期



第 五 卷

專 論

再論自由主義的途徑

教育與政治

從戰前標準看公教人員

待遇

印度通信

海德拉巴印度的問題 土邦 嚴紹端

婦女問題

從婦女運動看婦女問題

李 超

讀潘光旦先生婦女問題的

的論文後

黃碧遙

總統北巡與北方大

局 (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從濟南逃到浦口

觀察讀者投寄

記湖南田糧大貪污案

(長沙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韋伯夫人的「我倆的伴侶

書 評

生活

呂玉文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5)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2432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北平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版發行所：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

訂閱價目
 平寄：一元八角
 掛號：二元九角
 航空：三元六角
 掛號：三元八角
 航空：四元二角
 香港：港幣八元
 澳門：港幣八元
 國外：港幣十二元
 郵資漲價：酌扣寄刊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一百五十元
 全面：一百四十元
 普通：半面八十元
 通：三分之一面五十五元
 照碼實收，刊費先惠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分
 掛退：附郵一角
 航空：附郵一角五分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讀者投書

一個老百姓的控訴

編者先生：內戰的烽火，一天比一天兇猛，由東北而山東、河南、湖北、以至江淮河漢之間，最近濟南失守，守城司令官王耀武突圍被俘，自攻城以迄於破城，中間僅歷十日，（十四日至廿四）其間雖由於南線吳化文兵團的叛變，致機場易手，但這種種，在在說明一切都予政府軍以不利狀態，戰局已跨入一新的階段。最近徐州為最突出的目標，局勢已緊張極點，但是，有一個基本的理由，是老百姓所要問的，共軍究竟是靠了什麼壯大？國軍目前嚴重的局面是怎樣造成的？

這問題就是坐在南京辦公廳的人也在日夜思索，答案却沒有，原因是他們並沒有真正和下層接觸。十二年來，中國最大多數的老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已遠非皇宮裏的人們所能想像。在這十二年，除了官吏、豪門、資本家，投機家外，很多的資產階級破了產，作為社會安定力量的中產階級也沒落了，這中間，少數雖還撐着個空殼，骨子裏却窮得不堪。雖然因為兵役的關係，受教育的數字是增加了，可是小學、中學、大學大都是苦讀的學生，許多大學生完全靠公費維持，或以工讀的方式獲得費用，家庭並沒有分文接濟。佔最大多數的農民，都窮得只能靠百分之五十的實物高利生活，買一雙襪子一條毛巾已經是非常奢侈的享受。這現象，說明大部老百姓的生活的確是活不下去了，他們是想「變」了。

「國民黨執政以來，我們別的滋味都沒嚐到，只感到我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百姓都骨瘦如柴了。」（馬敘倫語）這是事實，而這些毛病在那裏呢？

第一，政府所加給老百姓的桎梏莫過於保甲制度。在鄉間，鄉保長成了太上皇，有生殺予奪之權。要兵，通過他，他能隨時隨地抓任何人，打任何人；要糧，通過他，它能叫大戶不必交，小戶滿天飛。今日老百姓所最痛恨的莫過於保甲長！它是宰割老百姓的利刃。江西豐城鄧圩鄉鄉長由一個流氓起家，在任十年，居然嬌妻美妾，大興土木，鄉公所、別墅、公館、十周年紀念由全鄉攤派慶祝費用，邀宴士紳，最後派款樹起紀念塔一座！現在資產已在千億以上。這是一例。

第二，政府給老百姓的第二個恩典，莫過於軍風紀。鄉間除了水災、蟲災外，還有所謂兵災。在東北，因軍隊而引起東北人士對南方人間的仇恨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我在東北時親眼看到一個二等兵可以跑到民家叫他殺雞，而東北人也就殺隻雞煮爛給他吃，在火車站一個軍人打東北人二下耳刮子，沒誰敢響半響。強佔民房、強借傢俱、強征車馬、甚至命令房東搬入廚房，自己却高踞大廳，在在皆是。民間一聽到兵老爺就頭痛，一見到兵老爺就畏縮。

第三，征實征兵。十二年來，全國共征了多兵，其中有幾個是富人？這些人有的沒有錢而被捉的，有的是和鄉保長有仇恨而被捉的，有的是實的，因「實」而普遍引起攤派的「災」，逼得人民叫苦連天，政府又辦了幾個保甲長？征糧的人來了，小戶要招待伙食送糧時，一百斤變作了九五，負擔的是什麼人？

第四，政府治下最大的缺點莫過於是非不分。現在做事全憑人事。而鄉間，壞人都在拍頭，跋扈，好人都受逼迫。做官的好官一輩子不得晉級，壞官則神通廣大。現在到處都是壞人的世界。無疑的，這些細菌的蔓延滋長，政府則是他們的溫床。

以上種種，叫人不能不懷疑，國民黨政府究竟是代表了那班人的利益？國民黨革命，究竟是革命的命？現在是窮人連根都給拔掉了，富人身上却不敢動一根毫毛。打二十多年內戰的，是窮人，出糧出錢的，是窮人，通貨膨脹所引起破產的，也是窮人，富人却大收漁人之利，放實物高利貸、做官、拿造孽錢來競選，富者愈富，窮者愈窮，一把火快要點着了！窮人活不了了！

丁溪陽 十月七日 屯溪

末日

編者先生：這兩天上海的現象真是反常！所有飯館、旅館、戲館、跳舞場、電影院，無不擠得滿坑滿谷，特別是酒樓飯店，情形真是可怕。拚命的喝，拚命的吃，拚命的叫，好像喝的吃的都不要錢似的。我們平時不大上館子的人，一走進去，看到那種情形，真真心驚肉跳。那種盛況，恐怕就是昇平世界，也沒有那樣的熱烈！我們知道，今天內地鄉村之中，幾乎百分之百都沉淪在饑餓線上，就是在上海，也隨處都可以碰見終日不得一飽的窮苦人民，然而你到那些飯館戲館去看看，那裏會相信今日中國之窮呢？今天大公報的本埠新聞版，幾乎以二分之一的地位，描寫昨天一天上海市場上搶購擠購的情形，一家衣服舖子可以在一天之內定製一百多套大衣，許多綢緞店的貨物在幾小時之內銷售一空，甚至要拉上鐵門，提早關店。這種情形，真好像世界的末日已快到了似的，每一個人人都變得瘋狂了！最近上海地產有的地方陡漲一倍，有錢的人不管好地壞地，抓進了再說！末日末日，我們處此危局，祇好嘆息。

藥良文 十月三日 上海

關於生產要素四分法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研究化學的人，對經濟學是門外漢，但看了五卷七期讀者

投書欄翁詠慶先生的信，覺得翁先生對樊弘先生的批評，混淆之處甚多。且生產要素四分法之不合理，已為盡人皆知之事實，茲就翁先生之原評，述數點意見如下：

第一，是酬報與利潤之混淆。酬報（工資）與利潤性質之不同，經濟學書上分得很清楚，工資是以「勞動日」為基礎，利潤是以資本的大小為基礎，此種經濟學ABC，不必多所說明。

第二，是企業家與精神勞動者之混淆。企業家與勞動者（精神的或體力的）之不同，應從階級的觀點去分別，他們是屬於兩個階級，把企業家看成勞動者，無異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對立的事實，一筆抹殺。

第三，是「勞動之化身」（價值）與「勞動本身」之混淆。資本可為「勞動化身」之儲存，而非勞動之儲存。翁先生似乎只看見「勞動」兩字，而完全忘記了「勞動之化身」（價值）與「勞動本身」之質的差別。又翁先生把「價值」與「物質」混為一談，勞動雖不能創造物質，但却能創造價值，亦即將勞動轉化為價值，亦就是里嘉圖所說「勞動化身」的意思。又從前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之累積（資本），其本身怎麼又能創造價值（利息）？若果能如此，勢必承認有限勞動，能創無限價值，是不是無中生有？又假使照翁先生的理論，則值一工之資本，應即為值一工之勞動，其所得工資（利息），如何如此之微？

其餘數點，稍加詳察，即易知道翁先生對現代經濟學上諸範疇之理解，不大清楚，在門外漢的我看來，尚且如此，在經濟學造詣較深的人看來，其疎漏之處，正不知尚有多少。所以在學自然科學的我看來，其批評實欠經詳細之研究與嚴密之考慮，討論學術，應虛心誠意，又以虛心為最重要，不然就足以阻礙進步！

余鑫年上 十月十日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 楊人梗：北京大學教授
- 劉大杰：暨南大學教授
- 王璧岑：
- 李超：
- 黃碧遙：
- 呂玉文：

再論自由主義的途徑

楊人梗

一年以來，自由主義遭受了左右夾攻，頗有無從招架之勢。我會發表過一些贊成自由主義的意見，所以也附帶地成了被夾攻的目標之一。本文是為答辯而寫的，但我不願以論戰的姿態出現，一則因為反駁勢須引用對方的話，如此將使文章拖得太長；二則有關政治的論戰每每使人動感情，有了火氣就不容易冷靜地推敲。對方的話會引起過我的推諉與判斷，其中有些是我應當接受的，有些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曾有人把所有自由主義者論歸納到一個陰謀，認為這些人都是在扮演一齣由馬歇爾所導演的戲；這種態度假使不是因為認識不夠，便是希圖拿「陰謀」一辭來封閉自由主義者的口。我不知道會有這麼一種「陰謀」，同時，我不承認我會被此一「陰謀」利用而不自知，我要抗議此種陰謀論，要求有發表我的意見之自由。

在「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文中，我會說明了我對自由主義的看法，至今我仍然認為我的看法是站得住的。有人以為自由主義是十八世紀的產物，在十九世紀中已趨沒落，到今日，根本再沒有什麼自由主義。這是一種太狹義的看法。廣義地說，今日的自由主義可以不同於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然而仍不失為自由主義；正如今日的民主政治或唯物論，已不同於古希臘時代的民主政治或唯物論，然而仍不失為民主政治或唯物論。因為今日自由主義的含義與過去的自由主義大不相同，所以有人主張另擬一個新名辭來代表牠，這個辦法是可以接受的，不過這個新名辭必須能確切地代表這個新意義，否則恐怕有更使觀念模糊之感。目前倡導自由主義的人很多，彼此意見却不一，為着有所區別起見，我會經採用進步主義一辭來代表我的一套看法，可是嫌太生疏。共產主義一辭原不是專指馬列一派的社會主義的，現在却變成專指這一派的名詞了，用不着再加上「科學的」區別辭；假使現代自由主義因為往返討論而使其含義明顯，則「新」或「真」一類的區別辭也將是多餘的。

自由主義者不但遭受左右夾攻，就是在自命為自由主義者之間，爭執可能更厲害，因為自由主義始終沒有一部經典或一套政綱來範圍她。看來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尤其因為有若干人濫用自由主義來為獨裁政治辯護；然而並不足以厭自由主義的存在；反之，這正是自由主義所以能始終存在，能由衰落而再生之故。無論自由主義者彼此所見是如何的不同，至少他們要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不滿於現狀而求變，求進步，否則便是濫用自由主義。人仍然要把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混為一談，於是有人要以極端個人主義的缺點來否定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誠然是尊重個性的，尊重個性才敢於打擊傳統勢力；這是促成鬥爭的動力，但鬥爭之目的並非為着爭取個人的利益。個人主義可能是自由主義的動力，但不是自由主義努力的目標。自由主義所要求的進步是指整個社會的進步，否則牠在已往不會起這麼多的作用，在今日更無存在之理由。因尊重個性發展而在經濟上主張自由競爭，這已是成過去的說法；自由競爭在經濟上既不再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那麼，自由競爭之說則不是構成自由主義的因素，而且已為多數自由主義者所放棄。有人以為自由主義不合於知識水準低下的民族，得不到廣大民衆的擁護而會自趨沒落；可是，在已往和今日，任何政治理想都不是一般人民所能了解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宣言又何嘗是一般人民所能讀懂的東西，除非在知識民主的未來，決不會使一般人民都能理解一種政治哲學，故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得不用口號來刺激，自由主義却仍努力要以理論與事實來說服。有人說自由主義不能刺激青年，不能滿足青年的熱情要求；我們要問：一種政治理想是否為着要刺激青年而存在的？自由主義者希望以理論來說服青年，不願以簡賅的言辭來刺激青年。自由主義者不能抵抗強權，每易為暴力所屈服，是事實；然而只是暫時的屈服，並不消滅，可能有若干自由主義者因鬥爭失敗而自認失敗，但是自由主義本身並未承認失敗；惟有不復存在的理想，才是真正失敗的理想。任何革命者都有過不得不屈服的時候——屈服到不得不接受他所不願接受的統治，自由主義者也不能例外。至於有人說自由主義者的態度可上可下，不上不下；兩面討好，投機取巧，是一種灰色的騎牆派。對於這種指摘，我們可以一點

來解釋：假使自由主義是一種可以兩面討好的東西，便不會遭受左右夾攻；假使自由主義者是投機取巧的，那麼，在運動盪不安的局面中，頂好不推出具體的主張，更不必表明與國民黨或共產黨之不同的看法。更有人說自由主義者是逢人皆罵，自許超然；這便要看對於黨與超然作何解釋。在我們看來，自由主義是無法超然的，因為他要在他所生存的社會中求進步。要在現實中求進步，便無法逃避現實。自由主義者的工具是說服，不願給人家戴上一頂帽子，因為他不相信黨人是一個有效的工具。

在「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文中，我會說明國民黨與共產黨都不是自由主義者的道理，在「關於中共往何處去？」一文中，我會說明我們不當堅持非甲即乙之見，自由主義者應有其存在的理論根據。有人認為自由主義的路線是中間路線或第三路線，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中間路線的意思是介乎左右之間。假如左傾是象徵進步的話，則自由主義是左而又左的，因為牠是始終不滿於現狀而在不斷求進步的。第三路線是以數目次序來區別的，初看很容易明白這個數目次序所以產生之故，但經仔細推敲之後，何以會定出這麼一個次序，是頗難解釋的。何況在同一時代中可能有三種以上的主張存在。自由主義的要義在於變，因此牠是一個創造歷史的動力；歷史在不斷地變，自由主義本身所要求的也在不斷地變。在這個歷史路線中，牠會一再地與其他求進步的勢力合流，等到此等其他勢力已不再求進步的時候，牠便與之分手，而指示出更進一步的目標。自由主義是始終走在前面的，始終不滿於現狀而要求進步，所以牠始終為掌握着權力的一方所厭惡。

正因爲自由主義不是共產主義，於是共產黨的同情者給予了自由主義者兩個厲害的打擊（我說共產黨同情者，因爲我不會看見中共抨擊自由主義者的言論）：一、自由主義者一面討厭舊秩序，一面害怕大革命；他們代表小市民階級的利益，害怕共產革命足以破壞他們的優裕生活，這種心情使自由主義者拒絕流血的革命而趨向於改良主義。二、因爲是改良主義，所以自由主義者崇奉英美式的民主，忽視了經濟民主；在目前的情況中，一碗飯應當較一張票更重要，假使二者不可得兼，寧肯犧牲一張票而要一碗飯。這種責難看來言之成理，可惜牠的根據是很脆弱的。自由主義者可能是改良主義者，祇要改良主義能夠行之而無阻；果使改良主義能夠追求進步，我們便找不出應當拋棄改良主義的理由。在必要情況之下，自由主義者是不反對革命的，也不會逃避流血的革命，因爲革命不免流血。已往的革命，在思潮上無疑地會受着自由主義的領導；在實際革命行動上，也一再有自由主義者參加或領導，至少自由主義者不會是反革命派。有人認爲反內戰即反革命，關於這一點，我想留在「再論內戰」一文中來答覆。今日的自由主義者誠然是以小市民爲主，但是他們所追求的進步，並非針對小市民的利益而言。「小市民」一辭並不一定是一個貶辭，雖然現在一提到「小市民」便彷彿有點侮蔑的意味。在已往，小市民已盡了牠的歷史使命；在今後，他們仍要擔負着相當的使命。中國今日的小市民已無優裕生

活之可言，事實上大半已是些無產階級；只因中國的勞苦大眾太苦，所以小市民仍然構成了一個比較優裕的階層。假使我們承認中國有小市民這個階層，可是階級鬥爭的理論不一定能適用於小市民與勞苦大眾之間，因爲這個小市民階層還不是勞苦大眾鬥爭的對手。自由主義者所要努力的並非保全小市民階級的既得利益，而是想以改良或革命的方法來提高勞苦大眾的生活水準，消滅各階層在生活水準上的距離。自由主義者決不怕「清算」，而且渴望着能實現經濟民主，進而希求知識民主，這便是自由主義者較共產黨更前進之處。前面已說過，自由競爭不再是自由主義的信念；那麼，從經濟革命的角度來看，自由主義者決無反對共產主義的理由與必要。民主政治的含義是隨着歷史演變而演變的，英美式的民主只構成這個歷史演變進程中的一個階段；假使牠在今日還有可取之點，我們便不妨採納這些可取之點。民主政治演變到今日，顯然要包括經濟民主的意義，否則便是倒退或固着，必爲自由主義者所排棄。不過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一張票與一碗飯是同樣重要的，我們必須努力達到兼而有之的地步，然後可進一步追求一本書的民主。所謂「一碗飯與一張票當然是象徵的說法」；試想，如果沒有政治民主，手裏拿着這一碗飯等於是奉旨吃飯，雖然是自己勞力的報償，得來未免過於機械。「吃飯第一」的理論並非過效，至多只可用作一時期中鬥爭的口號，而不能真正使大眾滿足。如云滿足，人類將不會再有一本書的要求，人類文化的進步便會停留在這裏；何況，人類在肚裏滿足以後必然會要求良心的自由呢？思想史上的叛徒，有誰是因爲缺少那一碗飯呢？自由主義不反對共產主義的經濟民主，但需堅持要有政治民主；牠不會滿足於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因爲英美式的政治民主並不是政治民主的極境。對於認爲一碗飯較一張票更重要的人，我們要特別提醒一句：在我們還沒有得到一張票以前，千萬不能放棄這一張票的要求；否則民主主要和我們隔得更遠。假如我們真的有一張票在手，那麼，我們便可能利用這一張票來爭取一碗飯；至少不會阻止我們要求這一碗飯，故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是絕對不相衝突的。至於有人以爲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張票，那是違反事實的說法，讓事實去否定牠好了。

復次，我們指出，有許多人在事實上採取了自由主義路線而不自知。有人認爲現在橫在我們面前只有兩條路：維持現統治或者革命；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走國民黨的路或共產黨的路。對於有志於實際政治活動的人講，這種說法是最現實的；因爲目前只有這兩個黨有實力，最近的未來之政治舞台仍將是以他們爲主角；我們倘不擇一而「事」，便會陷於兩面不討好而被擠於政治舞台以外的狼狽境界。可是，一個公民雖然很關切實際政治問題，但不一定要參加實際活動，而取得個人在政治上的權勢；在事實上我們沒有擇一而事的必要，在理論上也沒有被迫而加入國共之一的道理。就全國人口總數看來，不但國共兩黨黨員所佔的比例很小，就是誠心以全力支持二者之一的也爲數不多；廣大的民衆只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接受或此或彼的統治。公民的生存權利是一事，政治主張是另一事；大多數人民並未感覺到非於兩條路中擇一而行不

可，就是今日的蘇聯，也並沒有剝奪非共產黨公民的生存權利。今日已經不是容許我們餓死在首陽山的時代，既然生為中國的公民，便無法逃出中國的現實統治；超出了現實，便是空想。如果認定只有兩條路的話，那麼，我們生存在那一個統治之下，如果不自承是此一統治的叛徒，便只有無條件擁護這種統治。「書生論政」原是一句帶有諷刺意味的話，意思是說：書生所論論開現實太遠。其實，這把「現實」二字看得太現實了；一切要遷就現實，因而阻遏了進步。論政不能離開現實，要進步則不能把「現實」二字看得太現實；故此我們要在現實的兩條路以外追求。假使現實到認定只有兩條路，那麼，生存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的人，如不自承是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同情者，則必須以全力支持「戡亂」政策。在「戡亂」的大前提之下，再不能爭什麼人權保障，爭什麼改善公教人員的待遇；因為在「戡亂」時期中，人權不免遭受蹂躪，待遇不免降低，至於法治，自由、與民主等都待「戡亂」以後再談。正因為我們不受這兩條路的限制，所以我們才反對內戰，爭取人權，呼籲法治。採取這種態度而具有是非觀念與正義感的人，並不會受着「只有兩條路」的限制，多少已帶有自由主義的色彩，即使他們不同意自由主義這個名稱。

從理論與事實的檢討，我們認定中國有數目的自由主義者存在，在今後的進步過程中，他們仍然是一個必要起作用的勢力。他們要如何才能起更大的作用呢？在「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文中，我曾說明自由主義者縱無組織，亦會起過很大的作用而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在「已往是如此，在今後仍然是如此。自由主義者不妨有所組織，因為組織就是力量；至於如何組織，那是一個必須依環境而決定的技術問題。自由主義者既時常各自受着理性與正義感的支配，那麼，縱有組織也會是相當鬆懈的，民主的色彩必然很濃厚，一鐵的紀律」是不適用的。組織不能嚴密是一大弱點，然而也是自由主義的好處。一種不受經典與教條支配的信念，其特點在於能不斷地依環境而提出新的進步要求；假使組織嚴密而能持久不懈，便不能提出新的要求，勢將遠反自由主義的精神。自由主義者雖有其政治路徑，雖然也參加實際政治活動，但是他們沒有一集團來獨霸政權的企圖。自由主義者要行使其歷史的使命，與其在前，還不如在野來得有力；故此，組織鬆懈並無害於自由主義的前途。一羣沒有組織或者只有鬆懈組織的自由主義者；在複雜的現實政治中，要如何才能起作用呢？與現存各政治實力要發生什麼樣的關係呢？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即是追求進步，此一原則可使自由主義者隨時決定他對某一實際問題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有其特有的見解，但是在追求進步的某一階段中，他們可能和其他的政黨合作，只要此一政黨在此一階段中有一個與他們所見相同的進步目標。對於已經完結其歷史使命而不願或不能再求進步的政黨，自由主義者決無與之合作的

教育與政治

四十年來的大學教育，大家都在嚷着久敗了。其實教育並沒有完全失敗，失敗的是四十年來的政治與社會沒有長進，因政治與社會上封建勢力的頑強，

可能。人類進步是由於不斷演變而來的，在此演變進程中，各個勢力或各個因素在彼此相激、相盪、相摩擦、相協調，時而彼此接近，時而彼此突然隔離。歷史是由這些複雜演化關係而形成的，自由主義始終是這演化關係中的重要份子，決不因遭受左右夾攻而被消滅。自由主義者也能了解其他力量所具有的歷史使命，決不因所見不同而企圖消滅其他力量。在歷史演進中，各個力量都有其歷史的功能，當其功而完全喪失之時，即此力量不復存在之時，這一切只有讓歷史來決定。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必能容許其他相對立的力量之存在，同時亦深信其本身力量之存在，必須這樣才能有相激相盪的現象，否則人類的歷史將是沈澀而固着的，無演變之可言。

自由主義者所以堅持其信念與主張，決不是偶然的。在目前國共兩大勢力對立的局面中，最現實的態度是「擇一而事」。要兩面討好是不可能的，兩面不討好却是最不「現實」的，最聰明的辦法是暫時保持緘默，待機而動。自由主義者却要採取這極端一種既不現實又不聰明的態度；因為科學的精神使他們有這極端一種認識，他們的知識決定了他們所採取的途徑。民主態度使他們訴之於說服，由說服而產生的信念是極堅定的；故此，自由主義者不致因遭受打擊而放棄其信念，在追求進步的工作中，能時時表實其力量。假使有人說自由主義是違反時代潮流的，那麼，等着時代潮流來考驗吧！我時常檢討我自己的看法是否有錯誤，只有說服才能使我承認錯誤，武斷是不會使我考慮的。誰都在嚷着民主，要求民主的人先要具備民主的態度——說服，惟打說服才能使人的感情不受損害而能接受理性的支配。拋開理性而訴之於威力的霸道行為，是阻遏進步的；牠可使進步的力量彼此抵消，使落伍的力量得着一個喘息的機會而延遲了社會的進步。自由主義者之所以能够容忍，就因為牠願意讓其他其進步的力量並存，而與之起相激相盪的作用。在目前這個混沌糊糊的局面中，我們尤當保全求進步的力量，保全得愈多愈好；故此，我再說：進步的力量不應彼此抵消。

本文是為答辯而寫的，所以着重在消極方面的解答，至於自由主義之積極的意義，我仍堅持我在「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文中所提供的意見。文章寫到將近要結束時，又讀到了幾篇贊成自由主義的文章，使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醒反對者：這只是時間上的偶合，並非由於一種確定的「陰謀」，自由主義者的意見既然彼此不同，我只能對自己的意見負責。我們不妨爭辯，但不希望把各人的意見混為一談來羅織成一種本來就沒有的矛盾，更不希望斷章取義來突破一點。必須如此，爭辯始可與說服的原則符合，否則仍然是憑藉強力的霸道，再用不羞有所爭辯了。

劉大杰

阻礙了教育進展的歷程。許多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對於教育並不是沒有信念，大家相信教育可以推動政治，可以改造社會。教育是國家最高的文化水準，是

一切事業的根本。教育不良，其他事業的改革與推動都無從下手。人心惡劣，不講信義，要提倡道德教育；迷信普遍，生產落後，要提倡科學教育；體格衰弱，疾病叢生，要提倡衛生教育；營私舞弊，投機取巧，要提倡公民教育；謀業不易，生活艱難，要提倡職業教育。這些教育的主旨，實在都沒有錯誤。按其實際，這幾十年來的教育，一點沒有達到我們的目標。社會上一樣是貧窮、病弱、愚昧、自私、失業、和人心的腐爛、道德的低落。表面上教育確實是失敗了，真實的原因，是封建的舊社會不能與新教育調和，黑暗的政治，妨礙了甚至摧毀了教育發展的機運。教育為改造社會的工具，這句話並非誇張的謊言，但政治社會的性質，時常影響了或是轉移了教育的效果，光明的社會，教育愈光明，黑暗的社會，教育愈黑暗。好比，現在大家都在喊缺少建國的人才，許多有專門知識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飯碗。學校裏是科學教育，外面是迷信社會；課堂裏講的是學問，社會上講的是人情；學生寫的是白話，機關用的是文言；先生教學生正直，商人教青年欺騙；學校所提倡的是民主和自治，政治上所盛行的是包辦和統制。在這些地方，演成了教育與政治社會的矛盾與衝突，這是目前中國教育界最嚴重的危機。從大學圖書館和課堂的玻璃窗中望出去的世界，對於青年們是一幅美麗的遠景，各人的心目中，充滿了推動政治改造社會的雄心，出了校門，走入社會，才知道是所學非所用，所想非所想，所見非所見的一個充滿了黑暗陰謀投機取巧的世界。從這時候起，許多好的青年，（壞的更不要說）爲了生活，爲了出路，勢必與這種黑暗政治與惡劣社會同流合污，結果他們出來不僅沒有改造社會，反而增加了一種相反的力量。說起來，這實在是中國教育的悲劇。

因此，近來有許多朋友對於教育悲觀極了，認爲要改進教育是百分之百的沒有希望，要改進教育，必得要先改造社會。這理論是道的，但是事實上並不容易。如果教授們全部離開了校門，一同去從事改造社會的工作，一方面是教育停了，同時在改造社會的那一方面，仍然是感着無從下手。我覺得關於這一問題，教育與改造的工作，可能雙管齊下，並沒有什麼大的衝突。最要緊的是教授們應當放棄從前那種教死書死教書的對於世事不聞不問的態度，應當放棄從前那種唯唯否否的游離主義，和那種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應當正視現實正視醜惡，對於黑暗的時代與社會，對於待遇的不平，對於自由的侵害，都應當表現勇敢的批評與積極的態度。這樣子，教育精神與改造工作才能打成一片。

我時常想，大學教育與中小學不同；中小學受政府的嚴格管理，還可以辦，大學則無法辦。大學在社會上有牠特殊的地位，在學術上要維持最高的文化水準，牠應當站在時代的前面，可以轉移政治與社會的風氣。因此，從事大學教育的人，必得要爭取學術的獨立性與自由的創造性，這兩點實在是大學教育的靈魂。我國二十年來由於訓政時期的黨化教育與最近一兩年來政府對於教育的嚴格管理與統制，教授的講學自由與學生的生活自由，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近年來，時常聽見人呼喊黨團退出學校，實際的情形，只有變本加厲。美國

的裴斐 (Z. Peter) 在「戰後的中國教育」一文中說：「在事實上，一個白色的清煉正在進行。當年的老人死去，或是爲了兒女的飢餓而辭職他去，他們所遺留的空缺，便由思想正確者來遞補。所謂思想正確者，就是國民黨徒認爲是可靠之流。這個清煉雖尚未腐蝕一切大學，但確已在開始。教授們在上課時處處當心所表示的意見，尤其是有關於政治的意見。一不留心，就會被人告密。在教授中及學生中正多着會告密的人，甚至在私人宴會中，教授不敢輕易表示意見，秘密使者，隨處都有。中國大學裏現所瀰漫的精神，不是學術研究，而是恐怖。在這種精神下，絕不會有真正的教育。」只要在在大學教過書或是担任過一點行政的人，覺得他所說的，並沒有一句假話。這位老教授前年到上海來，我們招待他吃過一頓飯，講過一次演，他臨走的時候說，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不久必有一次狂大的學潮。不錯，去年五月全國發生的學生運動，果然應了他的預言。

在這種高壓政策的環境下，用那些不懂教育的人來管理教育，教育的生機自然是日益枯竭，學術的獨立性自然是日益喪失。結果是教育成了政治的尾巴。正面的便是聖教，反面的便是異端。一面是違反了文化創造的自由精神，同時又阻礙了學術的進步。張東蓀先生說過：「現在大學中只講正統派的思想而置其他思想於不顧，這是違反了文化自由。文化的思想，只是一個批評的精神與一個容忍的態度。沒有一個學說與思想不可以批評，也沒有一個學說與思想不可以容忍。只要言之成理，都應得加以承認。總之在文化自由上根本不能有「邪說」，亦不能有「一尊」。這樣的精神，確是西方文化在人類上的唯一優點。中國以前沒有這個優點。現在既與西方文化接觸了，雖然有些傳染，但終嫌尚未十分接受。今後中國如果要想在文化上立足，則非大大向這一方面推進不可。」這一段話，我完全同意。只是今日負責教育的最高當局，未必能瞭解和接受其中的意義。

大概是「發思古之幽情」罷。在今日烏烟瘴氣之下，大家都在讚仰蔡元培先生的民主精神，都在追念蔡先生時代的北大。蔡先生的寬容，對於青年們的體貼與同情，待人的謙恭，自奉的儉樸，尤其是那種不與惡勢力妥協的正義感，造成了蔡先生人格的偉大，替北大奠定了民主教育的風度，充分地發揮了文化自由的精神。但在這裏，我們有一點必要注意，如果那一時代的統治階級，對於教育不是採取放任政策，蔡先生未必能成就那樣偉大的功業。北洋軍閥時代的政府，做夢也沒有考慮到學術思想運動與青年學生運動，會發生那麼大的力量。現在的統治階級，都是五四時代的過來人，他們都懂得要鞏固自己的政權，鞏固自己的地位，必得要爭取青年組織青年，於是對於教育採取了嚴格的管理與統制。蔡先生如果今日仍然主持北大，也必得受同樣的壓制。然而蔡先生的過人之處，是他不與惡勢力妥協，能去留爭自由，能以正義反抗現實，這一種奮鬥的精神，在今日全國的大學教育界，是無影無蹤了。

我們要求學術的獨立，並不是不要教育的政策。教育本來是隨着時代前進

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政治潮流，自然會有那一個時代的教育政策。封建時代是貴族教育，神權時代是宗教教育，君權時代是忠孝教育，科舉時代是八股教育。現代政治的潮流，是民主主義的政治，民生主義的經濟，民族主義的弱小民族的獨立自主。用三民主義作為今日中國教育的政策，實在是不錯的。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應充分培養民主的風氣與自治的精神，要講求解決民生的學識與技能，要鼓吹弱小民族的獨立與自由。在不要違背這一個教育政策的大前提之下，學術應保有絕對的獨立性與自由的創造精神。政府對於教育可以監督，所謂監督，應當是積極的獎勵與扶助。籌劃充分的經費，擴充圖書儀器的設備，獎勵學術的著作，保障教授的生活，解決學生的出路，要這樣教育才可蓬勃地發展起來。如果專從管理與統制下手，不僅無益於今日的教育本身，對於下一代文化的影響，會有嚴重的效果。

其次，今日的大學教育，在絕對的形式主義之下，失去了個性與生機。一

從「戰前標準」看公教人員待遇

王璧岑

幣制改革後，國內各報誌及立監委均曾為公教人員待遇的低微呼籲。在八年抗戰三年戡亂的過程中，公教人員和農工都被「打」得奄奄一息。此次改幣由於絲毫未帶平均社會財富的意義，農工收入未能改善，而成為現政府「基本幹部」的公教人員，更成為企圖「平衡財政」而「緊縮節流」的唯一對象，實在是改幣中不公而又不智的事情。

改幣後公教人員收入和戰前相比，一般均以銀元作計算標準，似欠正確。茲就筆者管見，提供計算方法多種藉作比較，期在「戰前標準」的前提下，看出今日公教人員收入究為戰前之若干。

一、以物價指數作計算標準：據中國經濟研究所調查統計，八月份上海物價指數改按金圓計算為二、七六八。則公教人員底薪與此數相乘，方合戰前標準。今底薪四十元者仍給金圓券四十圓，百元者實得五十二圓，三百元者實得九十二圓，六百元者僅實得一二二圓。則各合戰前之百分比如下：

- (1) 底薪四十元者： $\frac{40}{2768 \times 10} = 36\%$
- (2) 底薪一百元者： $\frac{52}{2768 \times 100} = 19\%$
- (3) 底薪三百元者： $\frac{92}{2768 \times 300} = 11\%$
- (4) 底薪六百元者： $\frac{122}{2768 \times 600} = 7\%$

二、以戰前美匯作計算標準：戰前對美匯率係按法幣百元合美金二九·五元供應外匯，約為美金一元合法幣三·三九元，即戰前底薪四十元者，約合戰

切只講表面，講條例，不注重內容和精神。教育部層出不窮的法令規章，既繁瑣，又呆板，一點也不能通融。功課的種類規定好了，時間也規定好了，必修的學分多少，選修的學分多少，結果是有的功課沒有人教，想教的功課又不能開。但是部定的課程標準，常有重複牽強的地方，學校礙於法令，只能照辦，對於教師的講學與學生的研究，都是一種束縛。這一系不能聽那一系的功課，那一院不能聽這一院的功課，限制嚴密，條理分明。在這一種環境下，學校都是一個樣子，學生都是一個模型。任何一個學校，都不能形成他特有的個性與學風，漸漸地都變成清一色了。

中國的社會，正在動盪變化之中，教育的工作雖是艱難，教育的效果雖是令人失望，我們要使中國成爲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還是要從教育入手。舊的教育制度已經過去，無須追戀那已死的殘骸。我們要有勇氣有毅力，一面迎合世界潮流的趨勢，一面適合社會的需要，創造一個優良的教育制度。

前一、八美元；一百元者約合二九·五美元，三百元者約合八八·五美元，六百元者約合一七七美元。現下按改幣後給薪辦法，底薪四十元者所得合今日十美元，一百元者合今日十三美元，三百元者合今日廿三美元，六百元者合今日三〇·五美元。但美國今日薪工物價等，則較戰前約增一倍，亦即今日美金二元，始合戰前美金一元。依此計算，我國改幣後公教人員收入相當戰前收入之百分比如下：

- (1) 底薪四十元者： $\frac{10}{11.8} \times \frac{1}{2} = 42\%$
- (2) 底薪一百元者： $\frac{13}{29.5} \times \frac{1}{2} = 22\%$
- (3) 底薪三百元者： $\frac{23}{88.5} \times \frac{1}{2} = 13\%$
- (4) 底薪六百元者： $\frac{30.5}{177} \times \frac{1}{2} = 9\%$

三、以銀元作計算標準：這是一般所常用的計算方法，同時也比較簡單明瞭，即以今日實得之金圓券，每二圓合銀元一元計算。但下列計算結果，如和上述兩項方法所得之結果作比較，顯然看出對金圓券之高估。此蓋因金圓券與銀元之法定兌換率雖爲二比一，但實際上金圓券二圓之實際購買力，則遠不及戰前銀元一元之購買力。按銀元計算，今日公教人員收入相當戰前收入之百分比如下：

- (1) 底薪四十元者： $\frac{40 \div 2}{40} = 50\%$

$$(1) \text{ 底薪一百元者} \cdot \frac{62 \div 2}{100} = 26\%$$

$$(2) \text{ 底薪三百元者} \cdot \frac{92 \div 2}{300} = 15\%$$

$$(3) \text{ 底薪三百元者} \cdot \frac{122 \div 2}{600} = 10\%$$

$$(3) \text{ 底薪三百元者} \cdot \frac{92}{108 \times 300} = 28\%$$

$$(4) \text{ 底薪三百元者} \cdot \frac{122}{108 \times 600} = 19\%$$

四、以生活指數作計算標準：這是改幣後政府凍結公教人員待遇政策的根據，同時也是本文所列四項計算辦法中，最不合理的一種。因為大體上政府認定改幣以前京滬區的生活指數，約在三百萬倍左右，而把金圓券與法幣的兌換率定為一比三百萬。在此以生活指數為依據的原則下，似乎算是恢復到「戰前水準」，其實生活指數所代表的究竟為何物，則除了改幣前作為計算薪資的基礎外，早已失去任何意義。其次，如果真實的生活指數真能凍結在三百萬倍左右也還罷了，事實上改幣以來物價黑市上漲的力量，已處處表現出大於管制的力量，如此而謂生活指數能夠凍結在三百萬倍左右，有誰能信。何況京滬區八月上旬之生活指數為三二五萬倍而非三百萬倍。改幣當時之生活指數當更不祇此數。即以三二五萬倍計，改合金圓計算，亦為戰前一〇八倍，依此計算，則在生活指數的標準下，今日公教人員收入相當戰前收入之百分比如下：

$$(1) \text{ 底薪四十元者} \cdot \frac{40}{108 \times 40} = 0.5\%$$

$$(2) \text{ 底薪一百元者} \cdot \frac{100}{108 \times 100} = 1.5\%$$

海德拉巴——印度的「問題土邦」

(一) 獨立夢

一年前，當英國人離開了印度，印度的三色國旗在全國每一個地方驕傲的飄揚的時候，海德拉巴士王邦(Hyderabad)不願意向這一面旗幟敬禮，不願意看見這一面旗幟，甚至把它撕毀，把它在腳下踐踏。因為海德拉巴士王，除了是全世界第一位富翁之外，還有一英國政府「最忠實的盟友」的榮譽稱號，而印度領袖們雖然從英國政府手裏把政權接收過來，但原來英王對於五百多個印度土邦所握有的「最高權力」却不曾同時移交給印度。「最高權力」隨着英國人的離去而自動消失，這五百多個小朝廷的王公們也隨着「最高權力」的消失而處於一種微妙的地位。海德拉巴在人口、面積和資源上都是這五百多個小朝廷的領袖，海德拉巴士王朝又有着效忠英國的歷史紀錄，於是

綜上四種計算方法，就中按物價指數作計算標準，比較最為正確，但所得百分比則最小；按戰前美匯作計算標準，所得百分比則較高，但所高有限。其所以高之原因，大致為今日美國物價薪金等已不祇較戰前增加一倍了。除了按照生活指數作計算標準，僅底薪四十元以下者尚可在「生活指數」標準下接近戰前水準外，其餘則均在百分之七至百分之五十之間，距離戰前標準極遠，有悖政府鼓勵公教人員奉公守法堅守崗位之旨。戰前五百元底薪的大學教授，其所得除可供五口之家生活費用外，尚可充分購置中外參考圖書，從事進修，今則不及戰前工友之收入，衣食問題尚難解決，遑論購備圖書。就筆者個人而論，即對自著之書，一旦散失，再向書商購買，亦已大感躊躇矣！其他更可想見。

當然，公教人員待遇，一經提高，國庫必然增加負擔。但所增如與戰亂軍費相比，則不啻九牛一毛。筆者主張廢除按四十元基數計薪辦法，而就京滬區標準，按底薪實足發給金圓券，俾公教人員收入得與戰前標準百分之四十相近，其他區域得視物價之高低減成或加成。最低限度亦應以京滬區為準按底薪五成發給金圓券，使平均收入與戰前標準百分之二十相接近，以免成為現政府中堅的公教人員，因過份偏枯，而流為貪污或降低工作效率，則國家幸甚矣！

卅七年九月十七日於南京

海德拉巴士王蔑視印度的三色旗，想自己另外豎起一面獨立的旗幟。也從那時起，海德拉巴變成了印度的「問題土邦」。別的土邦都已經先後後的加入了印度。

一年以來，印度與海德拉巴之間有着一項「維持現狀協議」，向時，海德拉巴代表曾經多少次次的到新德里跟印度政府舉行永久解決的協商，多少次的協商都不曾產生一點具體的結果。印度堅持着海德拉巴要像別的許多土邦一樣加入印度；海德拉巴則堅持着獨立的要求，或者說以獨立為要挾，在協商中討價還價，希望印度政府單方面的儘量讓步，最好讓步到海德拉巴能享有實際上的獨立地位為止。

「維持現狀協議」呢，印度派駐海德拉巴的代表蒙西曾經說過：「這就好像一樁試驗的婚姻。假若在一年之內生了一個孩子，婚姻將繼續有效。我在海德拉巴是做一

(德里通信)

嚴紹端

個助產婦，而我自己又恰好是婆羅門教徒，我相信一年之內將會生下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但孩子並沒有生下來，這樁婚姻的結果是懷了怪胎。首先是海德拉巴擅自擴充軍隊，私運軍火，跟巴基斯坦暗中交好等等行為破壞了協議的條款，接着印度便對海德拉巴實行封鎖政策。同時，海德拉巴的教族組織同教徒協會所私有的同教徒義勇隊，開始在土邦境內和土邦邊境上的印度村莊裏製造殺人放火的恐怖事件，回教徒義勇隊領袖拉白威每天都在對他的羣眾宣揚伊斯蘭的勇武精神，要他們爭取和保衛海德拉巴的獨立，要他們進軍德里，要讓海德拉巴士王在孟加拉灣洗腳。假若印度軍隊侵入海德拉巴時，他們將流盡最後一滴血，把寶劍握在手裏死去。在海德拉巴境內，只要不跟拉白威抱着同樣想法的人就會遭遇到慘酷的殺害。當這種無政府狀態籠罩着海德拉巴的時候，印度民衆們早已失掉了

耐心，埋怨尼赫魯政府的態度過於妥協。尼赫魯也發現海德拉巴土王沒有誠意，協商解決的門已經關閉。而海德拉巴土王竟以假定獨立的身份，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對印度提出控訴。就在這時候，印度政府對海德拉巴採取了軍事行動。海德拉巴土王的獨立夢也就這樣破滅了。

(二) 五天的「戰爭」

從民眾們期待已久的心情來說，印度政府的軍事行動發動得太遲，但在民眾們的熱烈狂歡裏，這次的軍事行動却又結束得太快。行動在九月十三日清晨開始，到了十七日下午土邦軍隊便宣佈投降。行動開始所激起的興奮還沒有低落時，勝利緊接着帶來了更大的歡呼。這次的行動使得民眾們的期望跟政府政策間的距離靠近了一步，似乎也使得民眾們的心裏有了一種新的信念。五天的「戰爭」使得舊時錯誤的誤症的海德拉巴土王認清了現實，使得回教徒義勇隊領袖拉白威變成了階下囚，被押解到他日夜想着進軍的德里。

這次印度政府動員了陸軍和空軍，而且分幾路同時進入海德拉巴邊境，目的是要在海德拉巴境內印軍原來的防地色肯德拉巴重新駐兵（駐在該地的印軍是今年年初撤退的），恢復和維持海德拉巴的治安。因此，官方的公報上把這次行動叫作「警戒行動」。在行動之前，印度政府曾對海德拉巴土王提出兩點最後的忠告：第一點是讓印軍重新駐色肯德拉巴，第二點是解散回教徒義勇隊。土王的拒絕決定了行動的開始，行動的結果這兩點都實現了。但是，回教徒義勇隊雖然已經解散，多數的義勇隊員都已轉入地下活動，直到現在，土邦境內還有着零星的暴力事件發生。這五天「戰爭」的一位印軍指揮官在接受投降之後已經變成了海德拉巴的軍政府主席，掌握了土邦的行政權力。印度政府還曾委派了一批民政官員協助工作。軍政府主席的任期可能只有一個月，以後將成立一個制憲議會，並將舉行公民投票，讓民眾們自己決定海德拉巴的未來。但印度政府目前強調的是恢復治安的工作，海德拉巴的未來以及行政體系的問題都還在討論，最近也許不會有甚麼具體的決定。一般的看法是，海德拉巴將正式加入印度，因為這是印度政府對於土邦的一致要求，一年來與海德拉巴的協商也不過爲了要達到這目的。現在這次軍事行動在實質上並沒有多大的影響。另外一種極端的眼光則認爲所謂「加入印度」的問題已經不復存在，因爲印度的軍事行動只是一個國家在其所屬地區恢復治安的行動而已。這一部份人以爲，未來的制憲議會甚至可能討論到海德拉

巴是否應該保持現有的地理形勢，或者實行肢解，併入鄰近的各印度省份的問題。

(三) 土王的存廢

在海德拉巴的未來問題中，土王的存廢問題是很重要的一環。大部份印度民眾，尤其是一般進步人士都主張廢除土王，把這歷史上殘餘的封建體系徹底埋葬，讓這次進入海德拉巴的印度軍隊在恢復治安的任務之外，還要做到更爲基本的解放海德拉巴民眾的工作。因爲封建的殘餘是不應該與自由民主同時存在的。但土王會不會被廢除呢？在軍事行動開始以前，印度總督拉加哥帕拉查理曾在給土王的一封信裏保證過，無論在任何情形下，土王的地位都決不會受到影響。在軍事行動結束之後，拉加哥帕拉查理和尼赫魯也曾對土王的「悔不當初」的表示加以欣賞。

土王自己也曾如泣如訴的把他心裏的一番委曲說出來。他在九月二十三日廣播裏說：從去年十一月間起，土邦內部的極端分子們逼迫他改組內閣，由勒克阿里出任總理，拉白威又擁有武裝的回教徒義勇隊，想把海德拉巴建立成一個伊斯蘭的王國，他自己不惟無法控制，而且被他們挾持着，完全失掉了自由意志。「很久以來，我都急於想跟印度和平解決，但他們每次都要我拒絕印度政府提出的建議」。他又說：「我是一個回教徒，但我知道海德拉巴是不能跟印度分離的。……海德拉巴的人口有百分之八十六是印度教徒，無論如何是不能變成一個伊斯蘭國家的。」接着他又說明，在勒克阿里內閣當權和回教徒義勇隊橫行無道的這一段期間內，海德拉巴民眾間的教派憎恨達到了最高潮，但當他們造成的危機到來，印度軍隊距離色肯德拉巴只有四十英里的時候，這一批人忘記了流盡最後一滴血的狂言，內閣辭職了，「留下我一個人來挽救垂危的局勢」。他無限感激的指出，這次印度政府的行動使得他恢復了自由，可以像往常一樣依照海德拉巴王朝的傳統來掌握海德拉巴的命運。

現在，前任總理勒克阿里已在印度當局的軟禁之下，回教徒義勇隊領袖拉白威也已被捕，或者將舉行審判，而土王的一篇談話，把所有的罪過都推到了阿里內閣和拉白威的身上，表示出了他的清白無瑕，因此，要求廢除土王的呼聲現在比以往更爲高揚，提出這種要求的人以爲：一個拉白威並不足爲海德拉巴自由的代價。

土王的一番悔悟是否出於誠心，那是另一個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當印度政府決定重新駐兵色肯德拉巴時，土王分明知道印軍的優勢，但却頑固的拒絕了印度的建議，

準備對印軍實行抵抗。這除了表面的顧全「威望」的理由之外，顯然還有着別的企圖存在。印度政府的軍事政治發言人曾對土王的動機給予兩點基本的解釋，第一，土王雖然不想在軍事上獲得勝利，但却想從抵抗中獲得間接的利益。第二，土王本人希望在與優勢的印軍衝突的機會中擺脫他實際上已不能控制的回教徒義勇隊。第二點沒有加以解釋的必要。第一點的理由是，阿里內閣和拉白威等曾經對土王說過，假若印軍進入海德拉巴，他們可以抵抗六個星期以至六個月的時間，在這期間裏可以希望得到外來的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在政治方面，他們計算着從聯合國裏獲得世界輿論的支持，因爲印度進軍的前夕，安全理事會已經決定要正式討論海德拉巴對印度的控訴問題。

(四) 土王的朋友們

甚至到了土王對土邦軍隊下令停戰之後，一部份敏感的人還曾把土王這種行動解釋作他一貫的技術，以爲他想拖延時間，準備聽取安全理事會的好消息。但到了第二天，土王便通知出席安理會的海德拉巴代表團撤銷對印度的控訴，而且鄭重的宣佈說，海德拉巴代表團已不再代表海德拉巴和他本人了。

有趣的是，安全理事會在許多重要的問題上都曾因了無法解決而延擱下來；這次海德拉巴自動的撤銷了控訴，理事會却決定這問題仍然保留在議程上。最熱心的是阿根廷、波利亞、和哥倫比亞幾個小國。（這幾個國家一向都很信從美國的意見。）阿根廷代表把印度與海德拉巴的關係直截了當的叫作「國際關係」，並且把印度的進軍海德拉巴比作意大利的進軍阿比西尼亞。印度代表解釋說，出席安全理事會的海德拉巴代表團是在勒克阿里內閣時派出的，那時候土王沒有決定的自由，現在土王要撤銷對印度的控訴，却是完全自由的決定。但阿根廷代表堅持着，假若土王本人不親自到安全理事會的話，那他所寄出的一切函電都不足相信。很多人都覺得奇怪：海德拉巴代表團所代表的政府已經不復存在，所代表的土王也已經宣佈了他不承認代表團的合法資格，而這樣一個代表團竟在聯合國裏引起熱烈的注意。

印度一向就認定海德拉巴問題是一個純粹的內部問題。因此這次的軍事行動才叫作「警戒行動」而不叫作「戰爭」。但想不到行動開始之後，竟會惹起國際間的過份關切。巴基斯坦的報紙上都把印度的行動叫作「侵略」，而且曾發生過示威遊行，遊行羣衆要求政府出兵協助海德拉巴。不幸的是，在行動開始的前兩天，巴基斯坦的國父真

納剛好死去，正在國喪期間，而印度行動的時間前後又只有短短五天，因此，巴基斯坦即使可能有實際表現的話，也不可能表現出來。但巴基斯坦代表已在聯合國建議，要求聯合國派遣觀察家到海德拉巴去。此外，英國外相貝文曾經很遺憾的表示說，印度這新自治領「竟發展了一種好戰的精神」。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也曾特別發表過一篇聲明，說美國政府對海德拉巴的局勢深為關切，他對於「放棄了和平協商的解決方式」一點也覺得非常遺憾。聯合國的美國代表似乎很欣賞印度所保證的在海德拉巴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土邦未來問題的諾言。客觀的說，假若印度的諾言實現，在舉行公民投票時又可以免除不必要的外力干涉的話，這對比把海德拉巴的控訴徒然保留在安理會議程上

從婦女運動看婦女問題

——論潘光旦先生的「婦女問題的一箇總答覆」——

要有意義得多。
土王有着朋友，也有着敵人。照目前的情形看來，他的權力雖然已經減少，他的統治地位却很可能維持下去。除非他自動的禪位給他的王子，印度政府大概是不會逼着他放棄王位的。但他的敵人却是他的臣民們，那些在封建專制政權下面長久忍受着壓榨與凌辱的臣民們。
海德拉巴的總面積是八萬二千七百平方英里，總人口是一千七百萬。土王一個人的私產佔去了五百多萬畝的土地，替他耕種的有一百五十萬農民，實際上就跟農奴差不多。海德拉巴王朝兩百年來的統治，固然使得土王變成全世界的第一位富翁，使他更沉迷的攬住封建的殘骸；但另一方面，貧困却逼使農民們走向覺醒的路。被統治者是不

會害着時代錯誤症的。在海德拉巴境內的特倫加那區域裏，從去年以來就發生過很多次的農民暴動，農民們紛紛反抗地主的命令，跟土王的軍警衝突。到了今年年初時，特倫加那區域的兩千個村莊，四百萬人口，竟在土王的統治之下自己另外成立了「人民獨立委員會」和「人民法庭」，實行一套新的經濟政治計劃。這區域有的叫作「解放區」，有的叫作「赤化區」。兩天，海德拉巴的共產黨已經被禁，也許是這一區域的問題引起了注意。從原則上說，海德拉巴的政治經濟環境是有利於特倫加那區域的發展的，假若環境沒有新的轉變，這將繼續是一問題土邦中的一個問題。
——九月廿九日寄於新德里

李超

五卷三期觀察，潘光旦教授在他的「婦女問題的一箇總答覆」裏把此前婦女運動，分為「抗議」和「解放」兩個時期。在這兩個時期中婦女運動都有相當的成功；而在社會和文化上有時多少相對的佔了些便宜。不過，潘先生認為在婦女自身却吃了虧了，吃的虧來自三個不同方向：第一，由於力不從心。第二，由於忽略了情緒生活。第三，由於性生活和母愛的傾向不能適當的發展。其所以從這三方面吃虧的根本原因，是此前的婦女運動為「捨己從人」，沒有尊重到「自然趨勢」。這裏所謂的「自然趨勢」，潘先生指為「從男女生育責任的分工，而有兩性生理上的差分，因以馴服女子為家庭動物，社會成為男人獨佔的局面」的這一套演化過程。根據這一番理論，潘先生認為：為女子自身健康，求社會更高明更和諧的境界，今後婦女運動應該進入第三個「位育時期」。

意義上實在是一貫的。我們所以斤斤於此項討論，是因為這些概念在目的是富有教育的意義。現在且提供一點芻見，敬請指教。
我以為認識一個社會問題有兩個原則必須注意：第一要從社會的動象中去考察，因為一個問題不能孤立於社會之外，必然和社會各方面都有關聯，這些關聯有時須在動象中顯現的。第二要從多方面去考察，因為一個人對於一件事既然有心去注意，同時心理上不免有些先存的状态，這些先存狀態甚至為不自覺知的、為求去蔽，必賴多方面去考察，把這些不同方面見到的比較、綜合，庶幾較近真象。自然認識婦女問題也不能例外。現在我們先看婦女問題在理論上是怎樣發生的？

轉化為「動能」，而成為外觀上可察知的運動，這外觀上可察知的運動，有容「潛能」宣洩的作用，到相當程度完成新「平衡」，原有矛盾乃不存在。由此以論「婦女問題」，我們可以說男女生育責任上的分工，原是社會進化過程中所必須，它的作用就是在求社會全面的協調，隨此造成重男輕女的局面又是兩性分工對婦女方面失調的部份。而維持這局面的「慣性」正是潘先生說的「自然趨勢」和「積習」。這矛盾成為「潛能」儲積着，若受外力影響，遂即發為「婦女運動」，它的目的正是求新平衡的達成。如果這種分析是對的，則男女生育責任分工中，由兩性生理上差分進而演化為重男輕女的「自然趨勢」是為不可抗拒的話，豈不違反社會發展的法則，而認婦女問題永遠無希望解決？我以為這是一種殘酷的錯誤！男女生理上的差分本身不是造成重男輕女的決定原因而是在「社會制度」引用了這差異以後才造成這種趨勢，根本的問題是「社會制度」，而不在男女生理上的差分，是則所謂的「自然趨勢」是「不自然」了。並且社會人類有過一段母權社會制度時代，那時的婦女同樣要負起生育責任，也有兩性生理的差別，為何這時母權反能駕乎父權之上？這證明潘先生所謂的「自然趨勢」是過去社會制度下的產物，社會制度是人為的，非不可改造的，所謂「自然趨勢」並不「自然」而是可抗拒的。我們想確保婦女有其適應而健康的位育，必需一反潘先生所謂的「自然趨勢」，並且要從社

潘先生這層分析，我們相信他有相當事實根據的，而最後潘先生所懸設的「適應而無礙於健康的位育」的理想，我們是擁護的。不過，我們要進而討論的有兩點：第一潘先生所指的「自然趨勢」是兩性生理差分必然而不可抗拒的結果？還是偶然而可抗拒的呢？我們必須先弄清楚這一點，不然則不能確保「位育時期」不再走回頭路，另成一種重男輕女的新局面。第二潘先生所認定的「位育時期」是應該繼「解放時期」而逕進的，還是此間應該還有另外一箇時期做橋樑？在形式上雖然前後是兩個問題，而在

一種社會問題的發生，是社會中一部份要素在全盤發展過程中失調的現象，所以社會問題祇是社會發展中一種非常動象。（這裏所謂的「動」不光是指空間上的「位移」，還包括內部的「變化」）我們不能否認社會也有其「平衡狀態」，但「平衡」不是靜止，是「動」的一種形式，是協調的；這協調也祇是相對的暫時的，它對某些方面是協調，可能同時對另一方面失調，協調和失調對立着，乃成爲一種反抗的「潛能」存乎其間，當它祇是統一於內部的時候，也就是平衡狀態，這時外觀上不易察覺其為動的，但當對立關係發展起來，到足夠推翻「慣性」，或者為一極外力所侵擾時，「平衡」隨將破裂，於是「潛能」

位育，必需一反潘先生所謂的「自然趨勢」，並且要從社

會制度的改造上着手。進而言之，我們所以擁護婦女有其適庶而健康的位育理想，不是遷就於「自然的趨勢」，而是為社會全盤利益打算，選擇了這樣一個理想為我們奮鬥的鵠的。

我們既已認為婦女問題是過去社會制度下的產物，則我們要研究婦女問題前途發展的情勢，也要從社會制度中去認識。而此後的「位育時期」是否繼續現在而逕進的，那要看社會全盤發展的趨勢怎樣。婦女運動原是屬於社會發展的一部份，它與社會發展間有互相影響、循環決定的作用，所以我們不能妄想它將是一種為所欲為的直線運動。現在我們先來考察一下以往婦女運動和社會發展的關係如何？

在奴隸制度的社會裏，婦女所處的地位用今日的標準去衡量，應該是無法忍受的，何以婦女運動不發生在當時而在十八世紀法國革命的階段，這是婦女在當時內心所積儲的反抗潛能尚不足以衝破當日社會制度所造成的慣性。文藝復興後人類從而發見一自我。社會制度因此開始起變革，兩性矛盾也隨之發展起來，此後受虛極人權思潮的激盪，女權要永的聲浪益見高漲，惟此前大部份祇是表現在言論著作中，正是潘先生所認定的抗議時期。產業革命後資本主義抬頭，生產制度變革了，女權要求由抗議進為要求解放的運動。這種發展和當時的生產制度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裏，一方面因分工精細，素無技術訓練而體力較弱的婦女，都得以勞動被引入工廠；一方面因家庭手工業交大规模機械化生產而凋殘，以至於破產，婦女們被迫走出家庭，出賣勞力換取工資生活。而中產階級的婦女同受自由思想的激盪也自覺地要求脫離寄生生活加入生產序列。因此婦女經濟地位漸趨獨立，從而取得相當社會地位。為要和男人在職業上競爭，她們要求教育機會平等。為要保護自己的財產，需要財產繼承和婚姻自主。這些同基於和男人在出發點上平等的觀念上。此後婦女的生活和人生態度因以改變，啓發了她們向上的新道路，然而她們同時又輾入資本主義的槽臼中，婦女問題和勞工問題起了聯系，她們心理上生理上遭受了損害，婦女問題至此實際上轉了課題。這裏便是潘先生所謂婦女吃

虧的地方，但是根據事實上的考察，吃虧的原因不是「捨己從人」的結果，同時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所給予的，因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一方面把婦女從家庭引誘出來，另一方面並沒給婦女在生育責任上準備過一點福利設施，她們一面要到工廠裏去做工，一面又要兼顧到家庭和子女教養的責任，在這不易求全而勉為求全情勢下被迫的吃了虧，這個虧正是她們為社會完整和種族延續過份犧牲的部份。是可敬而不可嘲笑的！

中國的婦女運動是跟着世界婦女運動而興起的，但因中國社會開始變革是近百年的事，所以婦女運動也發生得遲些；同時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不盡同於西洋社會，故婦女運動亦有其特殊性質。中國婦女運動發端在戊戌變政失敗以後，因為人民鑑於變政失敗，對舊的詩願式的政治革命要求已絕望，進而激發了種族革命的思潮，婦女運動便在種族革命的提引中發生了，辛亥革命前後都有先覺的婦女親身參與過戰鬥行列，從而乃有機會要求男女平權，但當二次革命失敗後婦女運動也隨着消沉，「五四」運動中婦女運動再起，直到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後，則婦女的教育機會平等、職業自由、婚姻自主、財產繼承等權益，先後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到現在女子參政也見諸事實。但是實際上能運用這些權益的祇是極少數中上層社會的婦女，同時此前各項婦女運動也祇是中上層社會婦女去參加，廣大的鄉村婦女羣，在這些運動中始終是在不自覺情勢下，但她的家庭手工業隨着帝國主義勢力的內侵，也摧毀無存，而大規模的生產組織不能在次殖民地的國土裏長成，她們在退無以守進無以攻的情勢下，所受的痛苦比前更為深刻。這是中國婦女運動不同於西洋的地方。

循着這些史實考察，我們可以見到婦女運動和社會發展的關係主要的有兩點：第一，婦女運動始終為整體社會變改運動中的一部份，不能孤立，也不能領先。第二，各種社會變改給予婦女運動的影響，祇有生產方法的變革予婦女運動有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婦女運動始終沒有超出中上層社會婦女的範圍，是因中國社會生產方法還沒有根本上的變改。以這兩點關係來說明潘先生所劃分的兩個時期

，是第一個抗議時期繼承文藝復興的影響而有的，第二個解放時期是應產業革命後的成就，如果歐洲文藝復興後不繼之以產業革命，則婦女運動將始終止於抗議的階段不會有什麼成就。唯其有產業革命造成婦女走出家庭的機會，給予經濟獨立的道路，才容許「爭個人人格」和「應社會需要」。這裏說明了婦女運動必須配合歷史背景同步共進。目今婦女運動雖然走過第二個解放時期，是不是歷史背景已經配合到走入第三個位育時期呢？我的看法是沒有，在位育時期以前應當還有一個時期，我這裏叫做「社會解放時期」。為了和第二個時期有區別姑把第二個時期改稱着「個人解放時期」。

我以為婦女問題原本是婦女被剝削的問題，雖然剝削的方式和剝削權力的建造先後有所不同，歸總是屬於經濟性的，婦女被剝削是男人通過「家庭制度」以遂的。「家庭制度」在私有財產制度社會裏原是一種經濟的組織單位，同在一個家庭組織中各個份子的經濟支配權並不平等。女子始終站在被支配的方面。人類一切活動為求生存上的完美，生育工作直接雖為種族延續間接也是為了生存上的完美，唯其兩性在生育中分工，男子所做多半偏重於直接獲取生活資料的工作，女子在偏重於負生育的責任中，其生活資料多是從男子手中間接取得，唯其有直接間接之別，是則有輕重主屬之分，因財產可為個人據有，觀念上給男人以剝削女人可能性，男人遂得在家庭中為經濟上的獨佔權力。所以私有財產制度一天不消滅則家庭始終成經濟組織的單位，女人則永遠為被剝削的階層，因為經濟佔有慾不是靠自覺或道德價值所能自甘放棄的，祇有私有財產消滅以後，人類對經濟上之佔有已失其意義，家庭不再是經濟組織單位，兩性的結合才有真正平等的一天。這個時期為全社會的福利打算，婦女順應其生物學上的法則，盡其最有價值的貢獻，則一適應而無礙於健康的位育「庶幾近矣！所以我認為有一個「社會解放時期」。這個時期不光屬於婦女的應該是全人類的，在這個時期把整個社會從剝削和被剝削的對立中解放出來。自然這是需要更大的努力的！

讀潘光旦先生婦女問題的論文後

黃碧遙

婦女問題有幸，最近幾次獲見於有地位的雜誌報章。

「觀察」五卷三期潘光旦先生的「婦女問題的一個總答覆」剛出現，第二天（九月十二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羅季榮先生又來一篇「婦女、事業、家庭」。羅先生的

文章，標明是為潘先生的另一篇「家庭、事業、子女」而作。潘先生在很短的期間，連續發表兩篇這樣的文字，可以看出潘先生對於婦女問題的重視。

潘先生在「家庭、事業、子女」一文中，這麼地寫

「把一己子女的初期教養，根本看作事業的一種，我認爲這是最可行而也是最相宜的一途徑」。

「既明且恕的一個看法，是把一己子女的生、養、教，當作一種事業的看法。」

潘先生根據這種看法，提出兩項建議：

一、發揮此種看法，使人服膺。

二、父母應有兒童福利的修養，並使專家的知識

識化。

不知是潘先生在發表這篇文章之後接到了許多質問，還是自己覺得對於這個轟動了兩個世紀的婦女問題，覺得曾有未盡，總之，他接着又發表了「婦女問題的一個總答覆」。這個「總答覆」，要點如下：

潘先生說婦女運動已經有了兩個時期：第一個是抗戰時期，「是與男子抗衡」，「是對家庭革命」。第二個是解放時期，「是爭個人人格」，「是應社會需求」。將來將有第三個時期，即「位育」時期，「是將促進女性健康」。

潘先生認爲引起婦女「與男子抗衡」的男女重女輕的局面的養成，「一半因爲積習」，一半「由於自然的趨勢」。他着着實實來了一大段的說明，他說：

「我認積習，是誰都知道的，我說自然的趨勢，怕就有人不同意。其實這趨勢是最明顯的。陰陽兩性的分化，原是一個有機演變的事實，遠在人類登場以前，便有過極悠久的歷史。……就最基本的新陳代謝作用而論，陽性是謝多於代，陰性是代多於謝；在後者，唯其代多，所以能負起艱苦的生育責任；在前者，唯其謝多，所以才會有種種社會活動與文化事業的表現；也可以說，唯其謝多，唯其於生育之外，尚有多量的餘力，才終於造成了父權的社會，造成一種近乎男子獨佔的局面。我所謂自然的趨勢，就是這一番演化的經過。我認爲研究婦女問題時，我們於積習之外，必須承認這一層自然演化的過程；積習固然不健全，特別是對於女子，理應改革，就女子一方面而言，更理應抗議，但自然的趨勢，却是抗議不來的。」

潘先生以爲歷年以來，婦女從事於家庭以外的職業的人數，一天多一天。一部分職業，如教育、醫學衛生、社會工作等，女子的工作效率，往往比男子爲高；這固然證明了以前的禁錮政策，是一個歷史上的錯誤。不過，（潘先生說「這是一個很大的『不過』」，）這一來女子的身

體却吃了虧，損害了身心的健康。以後必須要婦女明白：「女性與男性根本上有些不同」，必須順着自然的趨勢，承認社會的分工，就其本位來工作。而我們（潘先生自謂）對於婦女運動，應當進一步的「導引它」，「控制它」，使之入於第三個時期，即「位育時期」。

讀了潘先生這兩篇宏論，覺得潘先生對於婦女問題，大有抱負。

第一：潘先生是有意引導婦運，控制婦運，一句話扭轉婦運。

第二：潘先生是有意爲婦女確立一種人生觀，使之安天立命。

首先，我們且看潘先生的扭轉婦運，潘先生是有意把婦女運動扭轉到它原來的出發點以前。

婦女運動的發生，無論在外國或中國，都是由於新興的資本主義勢力向陳舊的封建勢力爭取解放。在封建生活還能安定的時候，以中國來說：所謂乾坤尊卑；所謂男外，女主內；所謂二從四德；所謂婦人者伏於人者也等等，早是視爲天經地義，無一婦女敢於疑問。不意帝國主義者砲轟了我們的國門，沿海一帶，漸漸地散下了資本主義的種粒。異學校，開工廠，……我們的婦女，便一面由於主觀的自覺，一面由於客觀的要求，相率走出於閨閣以外。

到了辛亥，新興勢力進行推翻滿清朝廷。這一革命陣營中，有不少婦女在內。或則擔任宣傳與計劃，或則組織義勇軍；男女攜手合作一破前此禮教防閑，內外有別的告誡。

這一回政治革命，頗像法國大革命縮影。法國大革命初期發表了「人權宣言」，接着華傑女士就發表「女權宣言」，主張婦女須與男子平等，婦女須有參政權。辛亥革命陣營中的婦女鬥士，在共和政府成立之後，亦復要求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婦女須與男子平權。她們大鬧南京總統府，大鬧長沙、杭州等地的省議會，廣設堂，正式與男子抗衡。這是中國第一回的婦女運動。而其起步即在於踏出閨門，放棄家務，專心注視政治舞台，謀社會國家的解放。衝鋒陷陣，力竭聲嘶。婦女社會地位日後之得以逐漸改善，無可否認的是受了她們的厚賜，同時也是受了推翻滿清政府工作完成的厚賜。這回中國婦女運動的起點，即已證明它與其他方面的解放運動的緊繫聯繫。世界第一回轟轟烈烈的婦女運動，是出現於法國大革命

命。華傑女士的「女權宣言」，發表於一七九〇年。她正是大革命中一個健將，她的同伴的女鬥士，何止萬千？她們是包圍王宮，要求麵包的幹隊；是手執旗幟刀劍，衝向巴士提獄的先鋒。等到路易王室推倒之後，她們才敲鼓堂堂地轉向男性爭求女權。這也就證明世界婦女運動的起步，和其他方面的解放運動的緊繫聯繫。

中國方面，第二次婦女運動高潮是在「五四」時期。

這也是因爲婦女投身在思想解放，文化革新，反帝反腐敗政治的洪流之中。整個運動在社會收到了相當的成效，婦女因襲的束縛，也得了一部分的解放。如同婚姻自主、寡婦再醮、大學開放女禁等等。接着是「五卅」和北伐時期，這是一個空前的社會解放大運動，婦女又和男子並肩奮鬥，担負反帝、反封建、反剝削、反軍閥統治等工作。雖則北伐匆匆結束，婦女地位也有相當的進步。女子財產繼承權的成立，有配偶而與人通姦的科罰，也都是北伐成功後通過於立法院的。

所有這些爲解放工作而努力的鬥士，大都是有家庭，有子女；但在權衡輕重之際，不得不犧牲一身一家的小利。比方辛亥之前爲革命而犧牲了的秋瑾女士，她遺有子女在湘，自己奔走於國內國外。現在讀她的遺作，可以看出她的眼光直射在國家的存亡。她在中日戰後經過黃海，寫下好幾首詩，其中有：「聞道當年鏖戰地，至今猶帶血痕流。馳驅戎馬中原夢，破碎山河故國羞。領海無權悲索莫，磨刀有日快恩仇」。……另一首有：「忍看畫圖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倘使中國初期以及後來的婦女運動者們，各人只看重自己的家；工作的範圍限於家庭之內；事業的計劃限於教育子女；則不但中國婦女的處境，仍沉淪於封建桎梏之下，整個中國社會，也將比今日更爲落後；我們吃過了她們種下的解放果實，必不能反過來鄙夷她們的行動，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以自居於解放的罪人。

現在潘先生主張引導婦女重視家庭，以家庭中教育子女爲自己的事業，背棄社會國家的大舞台，重新促促於丈夫、兒女的小天地。使她們第一是看到家，第二也是看到家，第三，第四，……一直是看到家。再以家庭作成婦女的樊籠，而以廣大的社會讓男子單獨馳騁的，這當然要回到潘先生所說的「一男子獨佔的局面」，回到男主外，女主內的世界。所以說潘先生是有意將婦運扭轉到出發點以前。

其次我們且看潘先生的爲婦女確立人生觀，天命論。潘先生說：「女子的所以成爲家庭的動物，馴至家庭而外，更沒有其他活動的範圍與餘地，這其間也是一半由

於積習，而一半由於自然趨勢；積習應當改正，而自然的趨勢又是無可如何之事。女子因性生理的不同於男子，不得不大大地壓縮了女子向外活動的範圍，不得不安於一種比較靜止的生涯，而這種壓縮的範圍與靜止的場合，不用說，就是家庭了。這就是自然趨勢的說法。……所謂家庭革命的論點，一是對自然趨勢的革命，一是對積習的革命。我們根據上文的議論，可知對於前者的革命是徒然的。……易經稱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在大體上是對的，……」

自從「女權宣言」出世以來（附註：前面說過，「女權宣言」是法國大革命期間辜傑女士寫的。其後一七九二年才有英國克拉夫脫女士的「女權的擁護」出現。潘先生引用克拉夫脫女士的「女權的擁護」作為「女權宣言」，真正的「女權宣言」反未見垂青。或者因為辜傑女士的寫於流血的革命運動之中罷？不然，論時代，她的居前；論名氣，她的更大；論內容，她的更激昂慷慨。）婦女祇知道這男女都有人權，男女應該絕對平等，從沒有人相信尼采之輩的謬言，女子該屈服於男子的。即以希特勒的高壓手段，大吼「婦女回到廚房」！在他覺掌下的婦女，也還是陽奉陰違。現在潘先生却是以自然進化的趨勢，圈定女子於家庭以內。而且他的自然科學，上追伏羲象乾坤，源遠流長，令人不得不俯首敬服。

我不知道潘先生是否是倫理學專家，或生物學專家，或性心理學專家，這些東西，我全是門外漢。我祇知道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宗教、藝術、法律甚至科學之類。那一時代的統治階級，要想維持他們的命脈於無窮，必然要假借天神地祇，自然造化之力；必然要把現存的事物，描寫成爲合乎自然，永遠確定，一成不易的東西。這所謂自然，當然是「萬物存乎吾心」的自然，也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的自然；也就是「一切由唯心論出發的自然。」

易經的天乾地坤，男尊女卑的說法，表明它是男性中心時代的產物；易經的知幾，知變，以神道治天下，表明它是封建時代的產物。它的思想，統治了中國數千年；經過了封建生活的日趨崩潰，經過了「五四」追求科學人士的痛加打擊，到今天，本應早已壽終正寢，然而並不盡然。到今天，潘先生還以爲它有科學的價值，引用它以證明女性和男性不同的不可抗的自然趨勢。

潘先生的自然科學觀，是建築在易象乾坤的基礎之上。立在遺棄基礎之上，對一切的自然現象不必用科學，都

可以「元亨利貞」來解釋。我們婦女對這所解釋的「自然趨勢」，當然也和「三三三」解作「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一樣的風馬牛。

潘先生以爲重男輕女的局面的養成，除自然趨勢之外，另一半是由於積習。積習從何而來？天子嬪妃萬千；趙武靈王每夜男女僕數十；娼妓坐張熟魏；日本大地震後妓女接客的最高記錄爲二十四小時之內達四十八人。若說積習是根據「自然的趨勢」，則歷代的天子和趙武靈王之輩的男性，與乎日夜迎送的娼門女性，二者孰爲自然趨勢？

積習是根源於生活，根源於財富不均的物質生活而來。自氏族社會崩潰以後，婦女即失去了經濟權，日積月累，變成了奴婢牛馬。不但地位卑賤，形體也日漸脆弱。現在文明國中男女外表之差異，並非「自然的趨勢」，野蠻民族中男女的差異即甚微。

據研究過生理學的人說：人體的細胞，在細胞核中有四十八個染色體，形成二十四對。男性的第二十四對少一個，成爲奇數，女性則成爲偶數。女性所多之一個細胞，傳自父親，這便是男女兩性的先天的差異。這一點差異，既不能構成女性的卑下，也不能構成女性必須僅僅看家。生物都有兩性，牠們很少是「雌伏」。

不平等的的生活構成不平等的積習，也構成表面形骸的日更差異。一羣同年齡的男學生與拉車夫，一羣同年齡的女學生與童養媳或女工，比較而觀，形體的差異極大。現在不探求男女差異的來源而加以搗毀，反而要根據這差異來談分工，這是顯然的「維持現狀」，顯然地主張手指白晰細長的永遠拿雪茄烟；指尖特別粗大的永遠在三峽拉船槳。

由於「維持現狀」的觀念出發，才有不談生活革命而但談改革積習；才有不根據真正的科學而但以易象乾坤來談「自然的趨勢」；才有視「自然的趨勢」爲「不可抗」的天命論。這是潘先生的兩篇文章所給予的印象。

二二

現在爲時間所限，簡短地來個結論。

第一：「天定勝人」的說教早已唱過了送葬進行曲，我們今天，祇認定「人定勝天」。

第二：不由客觀的科學的論據，我們不相信從事戶外工作的婦女，一定有損健康。反之，過勞的家庭工作和高壓下過分抑鬱的妻女，她們的健康，才大有損害。

第三：家，不是必須和人類共始終的東西。原始社會祇有民族，沒有家；未來社會家庭將社會化。目前我們已

經不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家庭本位的生活了，我們的衣食住許多都已交給了社會來解決；這就沒有理由不交出自已的妻女，不使之爲社會服務。

第四：兒童教育社會化，不但解放了婦女，也解放了社會的負擔。一個婦女僅教養自己的子女，甚不經濟，並且提高了兒童的福利（因爲托兒所或幼稚園的老師，平均比家庭的母親更能勝教養之任）。

第五：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環，撇開社會問題單從兩性的差別來立論，等於隔了美國紋皮鞋來搔癢。婦女不從社會解放運動中來爭取解放，等於不爭取解放。

第六：當十餘年前希特勒大吼「婦女回到廚房去！」的時候，中國有些女名人，也大唱「賢妻良母論」。當時我曾寫過「媚聖班昭論」。現在班昭不出於女界，而由男性代替，這是中國婦女進步了的可喜的現象！

第七：縱使所有的知識婦女，受潘先生的「教益」而回到家庭，現狀還是不能維持下去。整個的「乾」「坤」都在翻轉，「天尊地卑」的說教不得不蕩然。

第八：我們婦女要從世界觀，來建立我們的人生觀，不要談聽盲從。

第九：眼光看到廣大的社會，於社會有益的事才是光榮的事業；給「維持現狀論」者添一根支柱，不是聰明的辦法。

第十：大胆地從事社會工作，於社會，於婦女本身，都是莫大的利益。蘇聯社會的進步，是一個鐵的事實。

觀察叢書

第三批新書

見下期本刊

總統北巡與北方大局

觀察 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去年十一月，蔣總統北巡故都，合併了保垣張垣兩綏署，統一了華北軍事指揮權，傳作義在「爲主席分憂，爲主任分勞」(當今副總統那時還是行轅主任)的口號下榮膺重任。現在快要有一年的時光了。總統又於就任後首次出巡北方，蒞平赴瀋，現又返平。當此時也，正是濟南被陷一旬，遼西烽火正緊，察綏殘破不安，而軍糧民食在秋收後十分嚴重的時候。

山東共軍動向

華東共軍攻下濟南，對全面戰局影響是相當重大的。一則是華東共區與華北共區更加壯闊的連在一起，再則是渤海上的形勢有了變化，青島將被拋在背後。因此江南的京滬，華北的平津，都感受到相當的壓力，使得蘇魯豫皖邊境上的國軍華東基地徐州，變成了一個前哨陣地，削弱了她向中原追擊的機能。這個大的變化和共軍今後的動向是值得研究的。

一般人推測今後共軍的動向不外三條路，(一)是沿蘇魯地區南下，直指京滬。(二)是與遼西察綏戰場呼應，揮兵北上，謀取平津。(三)孤立徐州，再攻汴鄭，爭取中原，威脅武漢。至於東去進攻青島，一般人認爲無此可能，也無此必要，他們只要拿去煙、威、龍口就可以與旅大營口控制渤海了，用不到去爭美軍駐地青島，去變內戰爲外戰。

「軍軍是流血的政治」，只要是一個政黨，不管他被博士們稱爲甲種政黨或乙種政黨，他必然是以奪取政權爲目標，來實現其終極目的，這是無容諱言的事實。共軍要顛覆現政府，假如直接進攻京滬，自然爲最直捷了當。可是徐州附近國軍集有重兵，用以屏蔽京滬。共軍如果拋下徐州，從魯南到蘇北，企圖渡江取鎮江，以切斷京滬聯繫，這是一條比較冒險的道路。不過某些游離部隊如果再走吳化文的道路，那就會增加他們冒險南下的勇氣。畢書文部七旅的叛變，幸而發覺尙早，迅速解決，

不然這個亂子的確也不小；就是如此，長江下游已開始封鎖各港，派艦艇遊弋了。共軍要想沿津浦南下，濟南戰後，是否於短期內會有撼動徐州的兵力，恐成問題，而且節節南進，國軍拚力死守，兵力消耗甚大，萬一遇上大的挫敗，會使得一年來的順勢馬上變爲逆勢。軍事是瞬息萬變的，士氣的起伏，也恆常在一些意外的打擊或挫敗下有變化。共軍或許還是抓住順勢，徐徐運用，不以冒險硬拚，來求直接了當，以防備萬一的挫敗。

東西連橫大願得償的華東共軍，既不敢冒險南下，北進的確不失爲一個穩妥的辦法。從冀魯平原北來，有德石路做爲後方的聯絡補給轉運兵力的要道，遙與遼西、察綏共軍呼應，對華北腹地展開夾擊，更與華北共軍聯合，東面爭津沽及沿海地區，西攻平保地區，這樣華北國軍將陷於四面受敵的境地，而共軍可以穩步前進，立於攻守自如的地位。在政府政略軍

勢中，華中是國軍僅能發動優勢兵力進攻的地區，共軍如果要在華東抽出一部分兵力來加入中原作戰，使國軍僅有的優勢地區，也不能構成的進攻力量，在長江以北長城以南的廣大地區，分別發動攻勢，逐步消耗國軍有生力量，在長江以南游擊戰或半正規戰。我們知道國軍野戰軍主力大部分是在長江以北，共軍要真有心短期內決勝負，就可以在長江以北決戰，即使他沒有決心在長江以北決戰，這條走慣了老路，也還有再走的可能。識途老馬，如果既不南下亦不北進的話，還是會走老路的。

傅作義的看法

華東共軍固然有南下和再入中原的可能，但華北軍事當局，在濟南被陷以後，就估計山東共軍會北來。華北最高統帥傅作義是從來不輕於對人作任何預測的，連同他的新聞發佈員也同樣的在說，「只談昨天的事，不談明天的事。」而這次濟南失掉

以後，與傅有關的平明日報就發表社論，預測共軍下一步行動，是將呼應遼西共軍，夾攻平津。接着蔣總統率海陸空軍事大員北來，該報又於一日發表了一篇「從總統蒞平論北方大局」的社論。認爲「共匪在全國的壓力已經逐漸壓向華北一個地區，所以政府要打碎共匪的陰謀，也必須運用全國的力量，對華北作有力的支援。」內中還有一段說，「就軍事形勢來說，過去歷來的形勢，是魯豫地區陳劉兩匪，互相呼應，而在華北之間，則是聶林賀姚諸匪，互爲狼狽。單就華北地區而言，這半年以來的變化，東北形勢大致穩定，聶匪在河北察綏，並未討得便宜，實力尙有相當的損失。可是按最近的形勢，全國戰局却已開始醞釀不同的變化，首先太原驟立，晉陝匪軍對於華北國軍向西牽扯的力量可較爲增大。另一方面，濟南失守，陳毅匪部，究竟南下北上，還是不可捉摸的啞謎。最近遼西大戰，烽火正熾，匪之所爭，顯欲控制濱海點線，以阻滯錦於孤立。聶榮臻匪部與賀龍姚喆匪部，還窺綏包，其目的則

欲牽引國軍之西向。華北國軍需要對付之對象，已必將山東陳匪之行動估計在內，則其實力之加強，當無待論。」

華北當局對於目前局勢的嚴重與看法，從平明日報的社論中可以看出一個端倪。傅作義的左右們說，「我們的總司令有戰略的先見，可惜缺乏戰略的決心。」另一位在說，「並不是他沒有戰略決心，而是缺乏實力。」的確，傅作義要專對付聶榮臻還差不多，可是砍殺了十多個月，在西邊又殺出了賀龍姚喆保向前來，在東面又殺出了林彪李運昌來。這兩股共軍正在東拉西扯，分散華北國軍，使國軍東西奔命，戰線拖長，找機會吃「山西押麵」。

「麵條越押越長也就越細，越細就越容易吃。東北西北兩面緊張中，要再加上南面來的壓力，當然應付起來更加困難。」

傅作義崛起塞外，出總華北師干，開始是以察綏爲基地。在去年此時，華北各省糜爛不堪的時候，只有察綏呈現着一種小康局面。全長八百八十公里的平綏路，是北中國惟一的一

條數夜得以通車的鐵路。察綏兩省是所有縣城全在國軍手中。論戰績，抗戰勝利後，堅強的守住了綏包，內戰開始時力戰集寧，解圍大同，突襲張垣。憑着如此聲名煊赫一時，兩次增援河北，一次出兵東北，成了華北的所謂王牌。這張王牌在華北打出後，首先遇到硬碰硬的冰水一戰，算是殺了一個平手，傅部主力三十五軍折損軍師長各一人。過兩三個月，共軍又自冀西奔襲雁北察南綏東南地區，華北國軍由於兵力不敷分配，察綏的小康局面由此被破壞了，平綏路也被折斷，而表皮的察傷，漸漸潰亂了。歷北僅剩了一個大同，這前失去了幾個縣份。綏境一度緊張後，還算大體復原，不過伊盟中的產糧地五神山暖水，在前一兩個月就被共軍佔去了。察南蔚縣陽原，察東赤城龍關，察北多倫崇禮，均被共軍攻佔，錫林格勒盟及察哈爾部各旗大部早在共軍手中。察綏兩省人口合計不到五百萬人，察省號稱人口二百八十萬，十九縣市有七八個縣份已經完全被共軍佔去，其餘的縣境也大

部不完全了，打開察省地圖看看，政府控制區小得十分可憐，就在那一共百餘萬人口沿鐵路的狹長地帶中，他們出了十五萬壯丁，每畝田的担負越過了一年的收益。有地沒有人種，張家口的商店裏甚少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男人。人民在痛苦萬分中前些天由參議會派代表赴南京請願。綏遠情形或許比察省好些，但去年伊盟大旱，今綏南綏東各縣兩次遭受戰火。這次戰事竟逼近綏包，使得全省人心浮動。現在共軍雖已南撤，在收成上恐怕要受損失不小。總之，察綏的小康局面已成過去，察綏殘破了，而且人民已經付出了最大限度的糧和丁。他們今後不能對華北有什麼大幫助了，而華北當局，對於在賀龍姚喆康健民與薛榮臻環伺下的察綏，還得分心分力去照顧他。不然後門火起，也會燒掉堂奧的。

渤海風雲

由於山東半島的絕大部分被共軍控制，渤海的情勢起了重大的變化。渤海是華北東北對外的門戶，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似乎是兩扇大門，這兩扇大門盡失，開關閉的大權，自己旁落。而兩半島之間，共軍船隻來往，以東北的資源山東及華東的人力黏結在一起，那個力量是非常可觀的。另一方面國際及國內渤海上的均勢自此打破，更使得渤海上的風雲日緊。美軍事顧問團長巴大維巡視青島，美海軍部宣佈派混合艦隊東來。現在國軍用以接濟東北的秦葫兩港，外圍都有戰爭。共軍想一戰而定東北，所以不攻長瀋，而先攻遼西的錦葫地區。在向這個地區進攻以前，又先打濰榆及秦皇島一帶海濱，切斷關內外交通，並收牽扯作用之實效。現在錦葫地區，北失義縣，南失興城綏中，已完全陷於孤立地位。共軍前期攻擊似已告一段落，錦葫是遼西國軍設防的重心，且增到援軍一部，這個地帶還要經過慘烈的戰鬥。海軍總司令杜永清隨蔣總統北來，指揮渤海上的海軍艦隊作戰，協助保護秦葫兩港。北平中央社也在四日發表華北剿匪技術總隊突擊山東半島及旅大的航線的消息，內稱「予奸匪渤海軍區雁門運輸隊以不小的打擊……並獲奸

匪海上運輸隊文件及某方進出港口暗密旗號及某方各種軍票。」從這個消息看共軍海上交通，是存在着的事實。而龍口威海衛等港，共軍以自國軍手中繳獲的十五生地槍彈砲作為要塞砲，那些海口的防禦力量也較前大為加強，使得國軍小艦艇無法接近。國軍方面秦葫及塘沽等港則時常感受陸上的威脅。這渤海灣上的新形勢，是值得注意的，因為他關係着東北華北的安危存亡。

縱觀北方全局

無疑的，共軍秋季攻勢的重點在北方，山東遼西及察綏的變化以及渤海上的形勢已如前述。在東北長、瀋、錦三大城市孤立，東北大小十多個縣城的駐軍有三四十萬人，而這三四十萬人所需要的軍費又佔全國軍費百分之五十，這個沉重的担子不僅東北挑不起來，以全國之力來挑牠也非常吃力。長春，瀋陽的國軍是再守下去呢？還是有另外的辦法呢？在華北與東北三大城市類似的地方還有承德、保定、太原，及時常感受威脅的張垣綏包。那些地方是必守？那些地方要縮

短戰線？這些問題在兵力不足的時候是值得考慮的。蔣總統這次北來，借帶的海陸空軍事大員之多為空前未有，似乎國防部南京搬到北平來了。回來的人計有參謀總長顧祝同、聯勤總司令郭欽，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軍需署長陳良，聯勤總部參謀長呂文貞，國防部第三廳長郭汝瑰。這一個堂堂的陣容，可能對北方重大問題有重要的決定。此外為瞭解山西的實況，陸大校長徐永昌偕來；為明瞭東北過去更多的實況，將杜聿明自津浦前線召來，承德的石覺，太原綏參謀長郭宗汾也都來了。連日總統與各將領均有重要商談。人們在想，去年總統來時，保定張垣綏署合併，今年來時是否會將東北華北兩剿總合併呢？是否會將山東劃入華北剿總呢？停台海新軍已有一部北來增援，攻守補給、人事部署、這些問題或許最近均有新的決定。蔣總統到平後二日，曾去瀋陽駐一夜，召開軍事會議，三日返平，四日往宛平憑吊蘆溝橋抗戰聖地，他看到長城內外的烽火，與風沙

迷漫的抗戰聖地，縱觀北方全局，不知將做如何感想與決定。中國問題在北方，而北方兵缺糧少，從山東、山西、察綏西北，熱河東北各處來的一切壓力，都壓向北方心臟平津。平津軍事問題之外，政治經濟乃至青年教育問題，都比全國任何地方為嚴重。總統隨來的武職人員之外還有黨團方面的鄭彥棻、陳雪屏，而行政院副院長張厲生早就住在這裏。所以軍事以外的政治經濟教育問題在總統留平期間也是研究的對象。

限價一個月以後的平津，物價漲落問題，變成了有無問題，升斗小民以買不到棒子麵吃為苦。在暑期內當局傳訊各校「職業學生」以後，開學以來各校變得表面平靜，像「一二九」以前憲兵第三團駐在這裏的情形差不多。華北政委會還沒有成立，近期可能有所決定。蔣

總統四日中午還召見了一次息影故都的顧孟餘。陳雪屏鄭彥棻雖不參加軍事機密，天天迴旋於教授團團。總統官邸的消息，當局一再叮囑各報要以中央社發佈的為標準，生怕洩露了甚麼機密，或對元首有不甚恭敬之處。不過一個大的趨勢擺在人們的面前，一切大的現實問題存在於每一個人的生活裏。機密起不出現實問題，北方大局如此，國軍如何鞏固平津，搶救遼西，控制渤海，當為目前主要的課題。另外一些衛星據點，何處加強，何處放鬆，緩急輕重之間亦將圍繞着那一個主題來有所決定。假如要是想乘共軍在濟南立脚未穩的時候反攻山東，也許會在這裏有所籌劃，山東半島上的烟台和津浦北段，也是北面水陸兩路出兵的路線。不過也得先求穩定遼西與鞏固平津。

十月四日

世界知識社更正

上期本刊封裏下頁，世界知識周刊擴大徵求訂戶廣告中，日期應為十月十二日起至十一月十一日止。敝社誤寫成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十一日，特此更正。

從濟南逃到浦口 王大衛

九月十八號下午，

濟南緊急戒嚴，連大門口也不能去了。就在那天夜裏，我們被幾陣巨大的炮聲驚醒。抬起頭來聽聽，遠遠有機關槍的聲音，趕快跑到樓上去看：在南門千佛山一帶有很大的火光，商埠中心區緯四路的地方，起了騷動；紅紅綠綠的信號槍彈，不停地衝向天空。機關槍比先前更清晰了。我說：「這一次恐怕要真的打起來了。」站在我旁邊的老趙說：「不要緊，這是小股衝突。」於是我們又下樓睡了。

輪在牀上睡不着，大砲的怒吼越來越厲害；左右鄰舍的軍隊，也在開槍，弄得一夜不得安寧。第二天，大家以為到了白天總可以好些了，那知槍聲更密，雖然到了十點鐘才鬆一點，但大砲却又跟着來了。炮彈尖銳地叫着在頭上過去，爆炸的聲音，就在周圍接二連三地響着。到了中午，宿舍管理員跑來說，「情形不好，大家趕快預備，有家眷的在一起，單身人在一起。」於是我們幾

個人都鑽到地下室去。在那裏，除了根據槍炮聲來判斷戰事的演變外，外邊的實際情形一點也不知道，也沒有入敢出去打聽。這樣地留在地下室裏，每天只吃兩個饅頭，一直支持到二十二號早晨。到了二十二號，附近已經沒有子彈飛過的聲音了。當殷紅的太陽照上了窗子，大家都舒了一口氣時，我們以為那衝進來的「小股隊伍」，已經被打退了。不久，院子裏有人講話的聲音，愈講人聲愈多，愈嘈雜，在我們推測那當然是國軍無疑，但有人從窗口偷窺之後，說是共軍進來了，大家一聽，不禁失色。沒有人敢再說一句話。我低頭看看自己，身上還穿着制服，「完了，」我想

「沒關係，」他們又說：「咱們都是自己人，進來！進來！」為了怕他們多疑，只好進去。他問起我們的職業，行程；聽老李講的湖南話，一個共軍很高興地過來和他握手，說是老鄉。街心又落了幾個炮彈，我們窺詢有危險，便趕快離開他們。走到鐵道，才改變方向，依着鐵路往南去。

過了白馬上便碰上了共軍檢查站。那時我們都還穿着制服，只好據實告訴他們，並且拿出了服務證讓他們看。沒有什麼留難，摸了摸身上，打開包袱看看。一個共軍拿起老趙的照相機問：「這個還管用嗎？」「沒有膠卷啦，不能照。」他又放下了下來。隨後便讓我們走了。

離開了濟南市郊，直到泰安，這一段路相當平順，沒有遇見軍隊。進了泰安邊境，便有共軍的檢查站檢查。我們依然拿出服務證來。於是兩名武裝檢查員，便帶我們到「招待所」去。招待所是專為由濟南逃出來的公教人員設立的。我們到了那裏有一個指導員負責招待。也告訴我們那一套話，叫我們不要害怕，有什麼困難，他可以替我們解決。說完後弄飯來給我們吃了；我們又要來乘車的問題，指導員說已經給我們交涉去了。後來還是他帶我們到車站去。為了我們也是服務鐵路的人，所以站長很客氣地給我們每人簽了一張免票。當天晚上便乘火車向兗州來了。指導員臨走時還殷殷囑咐我們說：到了兗州，馬上去找招待所，免得多有麻煩。

第二天拂曉，便到了兗州，下車後沒待我們去找，招待所已經有人在車站接候了。我們先在招待所吃了飯，到了中午便有人帶我們到「鐵路局」去。一位負責人勸我們留在那裏，不必南來了，他說：「到那裏不是做事？何必一定跑到國民黨那裏去？在這裏，我可以負責給諸位一個適當的位子，我們八路軍是信實的，說什麼就算什麼，並且我們極歡迎諸位留下來……」我們各人都舉出了一個理由；有人說，家在南方必須回去；有人說暫時不願做事；後來他笑了笑說：「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不放心我們這裏，其實，我倒原替你們可惜，剛剛由炮火中出來，又要走進炮火裏去。」在招待所就攔了兩天，每天他們都這樣同我們「談話」，但結果我們也不再強留，隨即取筆寫道：「臨別依依，不能遠送，後會有期，祝君平安。」寫完了交給我們。問我們那幾天走，又問我們有沒有錢。本來，在濟南的時候，錢已經花的差不多，沿路買東西吃又用了一個很小的數目了，前面上路上還帶花錢，沒辦法，只好告訴他：沒有錢了。他馬上給我們每人一萬塊「北海票」，並且開了一張路單，然後把我們送到警備司令部，由警備司令部又送到警察總局，警察總局又送到警察分所。到了分所便可到渡口上去了。我們在分所及睡了一夜，第二天我們雇好了船，便飄盪在運河中。船到終點，便是夏鎮。到了這裏我們呼一口氣，好像離開一個彈藥箱不會再有危險似的；雖然那地方仍然是共軍，但不久我們便可入國軍的地盤了。

離開夏鎮，我們都有難以形容的喜悅。「不要緊了，放心吧，到了徐州先得洗澡，到了徐州先得洗澡，到了徐州先得洗澡……」我們身上還成什麼樣子？「是，我們從濟南一直到夏鎮一路平平安安地走過來了，一切的危險，恐懼都經過了，那麼應該在前面的路是平坦的大道，但萬萬想不到，却是佈滿了那樣多的荊棘。確上了國軍第一個

記湖南田糧大貪污案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長沙通信)

湖南剛卸任半個月的田糧處長黃德安，於九月十一日被扣押起來。黃的上台是去年九月十一日，不先不後，恰巧一年，這是繼胡邁之後在湖南的第二宗大貪污案件。案情被揭破的起源是這樣的：省田糧處長沙交撥所虧欠賦穀三萬七千石的案子，經新聞界揭發後，發展甚為迅速，不但交撥所本身的弱點，由這個案子逐漸暴露出來，而且省田糧處的一些內情，也因此而連帶揭發出來了。由於交撥所業務股股長楊堯聞風逃走，牽涉到該所所長任正凡，又由楊堯的介紹人問題，牽涉到省糧處前任人車室主任丑志昭，而這個案子的發展，更牽連到整個田糧處的清算。

省田糧處是素來被人目為一塊肥田的，因此大家對這塊肥田的注意，自然在意料之中。自從黃德安處長下台以後，外面說他不乾不淨的風聲，一直就很濃厚。黃處長也曾致函轉請報紙為他開謠。這事引起了省府當局的注意。

於是派何漢文、蔣伏生、黃維國三大員負責清查監交。這類案子，如果說馬虎一點辦，也許可以包涵過去的。但不料長沙交撥所虧穀三萬七千石的案子，却先爆發了。這對整個田糧處清查工作，發生了重大影響，而且由於楊堯的走，更使這個案嚴重起來。

楊堯出走以後，各方的推測和疑慮，益發加深。大家認為三萬七千石穀子非楊堯一人所能獲得。為着不讓重要的人犯也像楊堯一樣的金蟬脫殼逃走了，於是交撥所所長任正凡和前任田糧處人車室主任丑志昭，均於九月十日予以扣押。而前任處長黃德安亦於十一日下午被扣押到警察局司法科的辦公室，次日轉解到了地方法院。

貪污數字

黃德安在一年(缺十五天)的任內，究竟吞了多少農民的血汗？據各報所已發表的大略如下：一、長沙交撥所虧欠賦穀三萬七千石，案破後，該所業務股長

楊堯潛逃，該案查與黃德安有關。二、該處委派縣處長或專員時，大做買賣，傳說一個專員三百光洋，一個處長二百光洋。三、謊報控制民船二千條，冒領給養租金，去年六月至本年七月，糧食部共匯來儲運業務費二千三百六十五萬元，田糧處付出的僅一千一百〇六萬元，即以民船租金之名義報銷，現民船業工會及船員工會均出具文書，證明田糧處並未控制一條船。四、印製本年田賦證券，大批回扣沒有歸公。五、挪用公款：本年一月廿六日，廣東向本省購糧十萬石，價款三百五十萬元。一月三十日廣東匯來運費四十萬元，田糧處直到二月三日才進賬，二月十日匯來三十一億元，田糧處進賬却是三月二十二日，裏面有一億元，一直拖到六月份才進賬。運費僅付出四十二億元，而且是零碎支出，按照當時市市拆息，這筆公款獲利相當大。六、從去年到今年卸任時，承辦採購軍糧的賬一場糊塗，並有勾結米商牟

利與標實賦穀串通舞弊之嫌。七、虛報運糧損耗，中飽肥私。

被捕經過

黃德安案從清查到扣押，僅十三天。因為程主席接到太多控告黃的密告，因而組織三委員清查會，專門來清理這個賬目問題。黃本人從查賬到被押時止，對外僅發表過一次辯白的談話，可見他起先沒有覺得會如此嚴重，被押的前二天，本市某要人曾到儲英園五號找他，希望他快走，快快走！他和他的太太當時強硬的說：「問心無愧，用不着走」，九月十一日上午，黃案已經發展到了最嚴重的階段。到下午三點鐘的時候，黃德安的左右就有數人跟從監視，但因主席的手令尚未下來，所以他還沒有全部失去自由。下午六點鐘的時候，程主席即召省警局長劉人奎到省府面囑機宜，並手令將黃德安拘押訊辦。劉局長接到這個手令後，馬上回局派刑警隊劉隊附前往黃德安寓所傳訊

在劉隊附到他家裏

幾支插曲

黃案揭破之後，在反對派的公館裏，在一些有關方面的閒談中，透露了很多不見於報紙裏的新聞：

話說王東原主湘末期，不是一度盛傳李默庵將軍要來接王主席的位嗎？就在那時，黃德安因與李在長師同過學，便匆匆飛京。他快捷足先登巴結一番。結果李的命令沒有發表，黃反而招來王主席的不滿。王主席認為黃的行徑簡直等於「拆台」，王任最後一次省府常會上，王主席曾嚴詞厲色責備黃，要他辦軍糧應一拿出良心來，要對得起三千萬人民」。從這裏便可測知王對黃的反感了

以後，黃德安劈頭就說：「你也來了！」但此時他的形色已經很不自然，直到劉隊附宣告奉命請他到警局去談話時，他的臉上就頓呈灰色。知道事已爆發，祇好俯首無詞的坐着包車向警局駛去。及至被押在警察局中，他還要求與省府秘書長鄧介松通電話，請秘書長顧全他的面子，移到他自己的寓所看管。那知就這末一點要求也辦不到；對方甚至不願與他通話。當晚他被押在警局訓練室中，後來有人打警察局的官腔，怪他們沒有把黃德安關入班房，太客氣了。

第二天下午七時，黃德安又從警局起解到法院，他大約仍未真正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濃厚的幻想也還存在着。在通到法院的中正路上，他一邊抽煙，一邊東張西望，表現很鎮定的樣子，在法院審訊過後，他要求交保釋放，但未獲准。

黃德安其人

天下烏鴉一般黑，糧官無地不貪污。這是報紙上常時可以見到的大號標題。在今日這遍地貪污的情形之下，一個糧官(那怕是小小

主管)，若不貪污，那才是一樁天大的奇跡。然則，為什麼有些滿身油漬的人，逍遙自在；而惟獨像黃德安這類書生却做了「澄清吏治」的招貼，嘗了鐵窗的苦頭呢！

黃德安觸霉頭，主要的是他的政治資本原就不夠。他是「長師」的畢業生，長沙有兩個派系相爭的師範，即「一師」與「長師」，前者屬黨，後者屬團；長沙的黨團磨擦，可以說就是這兩個集團。他最先在楚怡小學當過教導主任，後在薛岳任內做了民政廳的主任秘書，及臨時參議會的秘書。據說他有結論的幹才，所以便被他的二個上司，臨參會議長趙恆惕和民政廳長周燭賞識了；而這兩個個人，便是他做糧處長的保證人和推荐者。周燭現在做了立委，是黃在中央的靠山。趙恆惕依舊是議長，黃在地方便只有靠這位老頭子，所以政治資本脆弱了一點。黃德安常喜以一介書生自居，而且在官場混得很熟，鑽營與拉攏的工夫雖未爐火純青，該也不算太壞。同時他的四六句子文章做得好，又經常有他的妹丈兼田糧處秘書劉

第二、據十四日湖

南日報省市新聞載稱：「記者詢問幾位參議員，他們的意見大致是：黃德安如果存在了貪污的念頭，當然萬死無赦；不過希望能夠澈底追下去，不管是什末達官貴人沾了肥的，一定要追個水落石出」，同日該欄的頭條新載，被法院傳訊的前田糧處七位科祕長的談話稱：「如果要追究這個問題，而是暴露整個政治的黑暗面，身置其境的人，到今天才深深感到，目前中國的官是作不得的，若干不明不白賬，都算在黃德安的身上，送了錢是得不到受者的證據的」。上面兩段話，頗堪玩味。參議員談話中「不管什麼達官貴人沾了肥」一語，該不是無的放矢，「有不明不白的賬都算在黃德安身上」一語，不是證明田糧處除了貪污之外，還有一些不明不白的賬嗎？很多接近官方的人都在談這件事，甚至連送錢及要錢的數目字都繪聲繪影的列舉出來。

第三、黃的後台老

周周嫻，是祁陽人。周的老弟現在當祁陽縣參會的議長；這次到田糧處查賬的蔣伏生司令也是祁陽人。據說蔣周雙

方在祁陽是對立的，在

黃德安未下台的前一向，蔣司令曾給他一信，告訴他祁陽現田糧處長，怎樣勾結縣參會，侵吞賦穀，希望黃德安派人去查，並且把田糧處長撤換。是時恰巧周嫻返湘，看到這封信，當然大為不滿。黃處長在這種情況下不好如何處理，於復蔣司令一封信，說食污事將派員去查。撤換該縣田糧處長却難做到，因為那個人並無辭職的表示。談話這件新聞的人，總是把這種關係與查賬的事拉在一起，但是假如黃德安不貪污，這樣的事是無論如何都拉不上的。這可說是黃案中的幾支插曲。

援黃運動

一些與黃同派系的人，想把黃牽涉得很廣很複雜，因而減輕黃個人的罪嫌，甚至使莊嚴的法律，也能「網開一面」。黃在警察局寫了一個「自白書」，據說黃已承認「經費之東拉西扯，有關方面之額外開支，實為處今日社會環境事實上難以避免的。倘因此而科之以貪污罪，於情毋乃未免過苛。實於仁者所不忍也」，自然如果把田糧處這

麼大的貪污案，全部一筆寫在黃個人身上，實在是「未免過苛」，且有失公平，但從油鍋給踢出來的黃德安，真如他自己所說的祇是一個「手續容或有錯誤，而用心不太惡」的乾乾淨淨的書生嗎？

「一介書生」黃德安每次在省參會作田糧工作報告時，都稱省參會為娘家，而有些省參議員也稱他為「嫁出去的女兒」。嫁出去的女兒回到娘家，也不免要受到一些責難，但總是撤嬌了事。此番事發，好些參公們為他奔走關說。辦案的人接受多少恫嚇的言詞，一位參公說：「黃德安，政府應該根據他的犯罪事實，犯到那裏，辦到那裏，不要東拉西扯，黃德安這次不是犯的違警法，為什麼要交警察局拘押？既然警察局轉移法院以後，為什麼警察局又把他提回審問，這樣在大街上押來押去，簡直是一種侮辱！」這時在場的幾位參公們聽了這番理論，都同意這種說法，表示非常憤慨。並且一度醞釀「援黃運動」的暗潮。但後來看到黃德安的犯罪情形日漸證實，又鑒於社會輿論的嚴重指責，祇好「按

兵不動」。但終於在九

月二十二日的省參會上爆發了「援黃」與「反黃」之間的爭吵。

當參議員陳觀與邱企藩提出了「澈查省田糧處舞弊事實，並將本會歷次會議檢舉該處弊端各案文卷，送請法院偵訊，以肅貪污，而隆法治」一案的時候，會場空氣突然緊張起來。首先發難的是陳觀，他情緒非常憤慨的說出了田糧處歷任的弊端，並說：「何漢文此番查案與前次以監察委員身份來湘查案時，頗有輕重。即以本案而論，僅重視黃德安而忽略分贓之主使者，及其他重要人員」。同時陳又抨擊何漢文在組織經委會的時候，援引所好。措詞非常潑辣。扯來扯去又扯到何漢文競選監委的事情來了。他說：「何漢文先生上次競選監委，把他票的人，他這次都特別另眼相看，並且還可以提攜！我們要注意這一點……」他這一說引起了投何票的參議員楊任嚴，楊盛嘉兩公馬上站起來反抗，於是你

查案大員的態度

白「援黃運動」暴

發之後，長沙各報記者紛紛走訪何漢文，蔣伏生，黃維國三監交大員，請對此事發表意見。適黃維國不在，由何漢文，蔣伏生二氏接見。據何漢文表示：「此事個人雖有意見，然擬等待頌公（程主席）發表意見後再行發表，因本人係奉頌公命令查案，只願以頌公意志為依據」。蔣伏生則表示了三點意見：「一、我是奉令調查黃案的，對於黃德安個人決無絲毫恩怨可言。對黃案之調查及處理，一秉至公，毫無私見，但要對得起湖南三千萬人民。我不能為少數人所左右，更不能敷衍塞責，因之在黃德安未押之先，黃即曾詩某要公向我說項，我當時即予嚴詞拒絕。二、黃德安的犯罪事實，不是我查出來的，而是他自己造出來的。現在田糧處的事情不查則已，一查便到處有毛病，黃德安在田糧處長任內，

實在搞得大糟了。關於自己造罪，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黃德安在法院裏向檢察官說：「那些領款證據，都是私人朋友的臨時借款，他們可以歸還」。但是在搜查他的證據中，發現了祁陽某要公的一封信，內容充分證明了黃德安所說「朋友臨時借款」，根本是賄賂人家，而這些證據，都是他自己造出來的。三、截至現在止，已偵查出來，移送法院偵訊黃德安的貪污嫌疑，已有三件。但在調查中者，尚有採購軍糧，勾結米商牟利的案子，這件案子，在黃案查污總數中，可算是一樁最大的數目。現在已經查了三天，最近又發現黃德安所報的風、水、火、糧食損耗，毛病非常多。

程主席對此案也對嚴重表示：「整肅糧政，是轉移社風氣，整飭吏治必須做的事情，假使黃案不如此水落石出，社會當然就沒有什麼正義是非可分了，我對此案非常重視，但一切制裁，必須依據法律」。近日聞地方法院對監交會移送過來有關黃案之文卷，雖尚在調查和搜索階段，但已有相當眉目，可能於十月中旬以前依法提起公訴。然而中途究竟會不會有故障，湖南三千萬人民都在舉目睽睽的看著這幕大貪污案將如何了

會不追問，今天來討論

實有「祖黃」之嫌。始終含默的趙議長也趁勢說：「保留，保留！」

（上接十六頁）

「濟南來的也不行，沒有錢不要坐車！」

「我們一齊都火了，」

「怎麼辦？你說怎麼辦？」

「補票！」他大聲地說。

「不補，隨你怎麼辦！」

就這樣僵持下來。對於我們是這樣地對待，我們又能說什麼呢？從患難中逃到所謂「平安」地帶的人，不但得不到同情溫暖，反倒是冷酷無情，這使一批從炮火中跑出來的人感到極端痛心。我不禁回想到在泰安到兗州那一段的火車，是一樣什麼樣子。同是一樣的人，為什麼那裏可以叫人安靜下來？縱使說那是一種政策，手段，然而我們為什麼又不能施行同樣的「手段」？我們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沿路的一切，多麼明顯地浮在頭上，可是，看了目前這種情形，兩個對比，心中感到無限悲憤；這不是因為了那炮火的驚恐，乃是為了這不幸的國家，毫無希望的國家的前途而傷心！

「懸崖尚不知勒馬」，可憐！一個國家的公務員，是抱着這樣的消極觀念，那麼在昏天黑地的老百姓，又將如何呢？

見到了一些老朋友，握手之後，道出了這出死入生的故事，大家不禁都紅了眼圈。談到最後的遭遇，又都唏噓長嘆而去。

會不追問，今天來討論實有「祖黃」之嫌。始終含默的趙議長也趁勢說：「保留，保留！」

（上接十六頁）

「濟南來的也不行，沒有錢不要坐車！」

「我們一齊都火了，」

「怎麼辦？你說怎麼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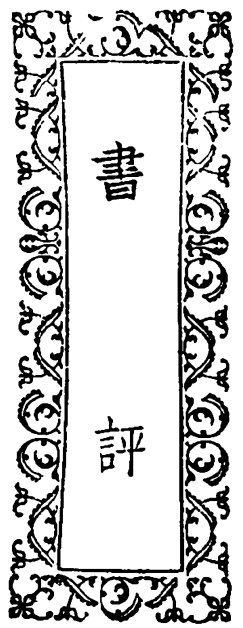
「補票！」他大聲地說。

「不補，隨你怎麼辦！」

就這樣僵持下來。對於我們是這樣地對待，我們又能說什麼呢？從患難中逃到所謂「平安」地帶的人，不但得不到同情溫暖，反倒是冷酷無情，這使一批從炮火中跑出來的人感到極端痛心。我不禁回想到在泰安到兗州那一段的火車，是一樣什麼樣子。同是一樣的人，為什麼那裏可以叫人安靜下來？縱使說那是一種政策，手段，然而我們為什麼又不能施行同樣的「手段」？我們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沿路的一切，多麼明顯地浮在頭上，可是，看了目前這種情形，兩個對比，心中感到無限悲憤；這不是因為了那炮火的驚恐，乃是為了這不幸的國家，毫無希望的國家的前途而傷心！

「懸崖尚不知勒馬」，可憐！一個國家的公務員，是抱着這樣的消極觀念，那麼在昏天黑地的老百姓，又將如何呢？

見到了一些老朋友，握手之後，道出了這出死入生的故事，大家不禁都紅了眼圈。談到最後的遭遇，又都唏噓長嘆而去。



韋伯夫人「我倆的

伴侶生活」呂玉文

CUR PARTNERSHIP, By Beatrice Webb. 1948 Longmans, 25s. pp.544.

這是一個偉大的女性所寫關於她夫婦的共同生活，由高尙的愛情發生改造社會的動力的一段紀錄。

韋伯夫婦的一生原是一個奇蹟，他和她各有卓越的學識和才能，抱着改造社會的宏願，又幸運地結合在一起，情智相通，作息與共，共同生活至半世紀以上，不斷研究、調查、寫作、鼓吹、運動，終於漸漸將一個舊式的英國改了過來；天復賦之以壽，到了老年還能雙雙見及他倆早年所播的種子長出鮮豔的花朵。如今將他倆的生活紀錄發表出來，格外值得珍貴；不消說，這是英國現代歷史中最親切的部分。

以前我曾讀過韋伯夫人的「我的學習生活」(My Apprenticeship)，裏面描寫她姑娘時代的生活，到一八九二年結婚為止。結尾這樣寫着：「我的學習生活到此結束，我倆的伴侶生活於茲開始。」一對建立在共同信仰上的工作同志，圓滿地達到結婚；也許這是一切幸福中最優美的，當然又是最持久的了。往後她倆生活的豐富、幸福、而有意義，一如她所預期的，大概有一天她會把他倆的伴侶生活寫出來。

這是一本有意思又有趣味的書，一開卷就引誘我一直讀下去，簡直欲罷不能，不多幾天就把它讀完了。我彷彿看了一捲這偉大的一對的生活影片，夫婦愛情的創造和大社會的行進打成一片。本來自傳是最真切的一種文學，現在韋伯夫人以一人而寫兩人的自傳，更是自傳中別開生面之作。況且內容取材，充分利用她的日記，活生生的記

錄，讀來倍覺生動貼切。

韋伯夫婦倆在實際上是一體的，他們慣常被稱為「韋伯伯爾」(the Webbs)，連他們的事業也被稱為「韋伯公司」(the Webb firm)。你不可能忽略了另一個而瞭解這一個。他們的著作大多是雙具名的，內容很難辨別誰寫那一部分。他們講話的時候，這一位說了「我們想：...」，另一位繼續下去「我們的意思是...」；有時他們中有一位演講，另一位答覆問題，下一回可能兩人易位，而所講的與所答的內容往往一般無二。當他倆任一位說「我們一時，所謂「我們」的內涵是明白的。在人格上，他們是不可分的，他倆是天生的一對，人間的雙星(Double Star)。

夫人對她的先生總是寫「另一個」(the other one)，指出他是一個社會的工程師，理想的打樣師，描摹他的特性——「為公的精神，對己的冷淡，堅定的目標，正確的智識，健全的判斷，靠了他這些能力貢獻於他所相信的社會改造，通過宣傳或立法或行政，得有這樣的成就。豐富的智識，明透的觀事，清晰的說理以及無休止的工作，是他對我們共同工作的特殊貢獻」。對於她自己曾這樣寫過：「恬靜，美與身體鍛鍊在我是高超的娛樂；還有我倆靈智上所特有的——相互的愛和強烈的智識興趣」。誠如她謙虛地所說的「一兩個第二等的智慧奇異地相補充」，埋頭研究，草擬文獻，是他出色善行的事，而與人交際，出外考察，又為她所擅長。兩下將長處湊合起來，終至成了不世之功。

全書除緒論外，總共八章：第一章從他們結婚建家起，描寫他倆怎樣確立生活計劃，研究工會運動的歷史與理論，寫成工黨活動的奠基大著。第二章敘述韋伯怎樣參加倫敦郡議會的工作，主持技術教育委員會，怎樣一同創辦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並確立倫敦大學的基礎。第三章說明前世紀末期英國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間可看出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都日就衰頹，而他夫婦兩及費邊社同志却正以銳進的姿態引導費邊集體主義。第四章表述他倆研究英國地方政府的努力，曾往各大城市實地考察，回來又勤勤地整理文獻。第五章是他們從事倫敦教育工作的紀錄，目標在使倫敦教育統一一化。第六章繼續敘述他們草定倫敦教育法及其後的情形。第七章說到他們參加自由黨政府所發起的救貧事業運動，和勞合喬治時代疾病保險法的通過。第八章繼續述說他們反對舊時救貧律的努力，他們盡力鼓吹要免除貧窮，完成充分就業，並維持每個國民的最低生活

水準。這裏面已提出以後充分就業的目標與預示最近英國的國民保險法的輪廓。

此書著作，一九二六年時即已開始，旋因研究急需問題，又從事二屆工黨政府的活動，暫時擱置下來。一九三一年費邊寫述，除了兩人同往蘇聯考察外，直至她一九四三年逝世，沒有間歇。遺稿由德賴克夫人 (Barbara Drake) 與柯爾夫人 (Margaret I. Cole) 幫同輯訂，韋伯先生生前交給慣替他們出書的 Longmans 書局出版。內容從一八九二年起至一九一一年，依說這不過是第一卷，不幸韋伯伯今亦老成謝世，續本如何尙不可知，好在漢米爾敦夫人 (Mary Agnes Hamilton) 所著他們的傳記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A Study in Contemporary Biography)、寫到致察蘇聯為止，至少可暫時補充這個不足。

這一對偉大的夫婦今已長眠在威斯敏司寺了。回想他倆一生在思想上和功業上的成就，未嘗不是愛情的贈與。賢伉儷的愛情到老彌篤，夫人覺得一日不能離開她的「另一個」，看她所寫的：「當他不在時日子這樣過得不耐，在失眠之夜我怕起鬼來了，我不是畏死，實因沒有他生活便可怖」。我想要不假以天緣，他們各自對祖國和人類的貢獻，即使加起來也未必有這麼多吧。

從這本書的描寫中，我看到陳舊的英國一天一天在向着他們所理想的方向變，足證思想確有支配時代的力量；又看到當代一時俊彥的動態，足見有為者確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在英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韋伯夫婦無疑地扮演著主要的角色。此書內容於我啓發頗多，讀後不欲自秘，用特介紹國人。

來函照登

逕啓者：查貴社觀察第五卷第三期讀者投書欄考生控訴(三)投考藝專落榜者投書一則，該文措詞詭譎，虛構事實，頗係挾嫌中傷，企圖破壞他人名譽，彰彰明甚。查敝校招考新生，照章組織招生委員會，計定分數，然而拆啓密封，錄名放榜。謂敝校校長個人圈定，核與事實不符。至於訓導處請遷讓研習會等教室一節，因招考新生完竣，開學在即，自應籌劃準備，不能以少數人之方便，而妨礙公眾事務。用特函請查照，惠予更正為荷。
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謹啓九月廿二日 杭州